中國共產党的九十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目录

第九章

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本章提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而载入史册。以这次会议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以后，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化改革开放，经受住国内外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由之路。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帮派势力仍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稳定局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经过艰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十年内乱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它在政治

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形成，固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在错误方针指导下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有关。而这种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得到延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 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信（部分手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四人帮”的斗



★ 1977年底，参加高考的考生正在认真答卷。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党的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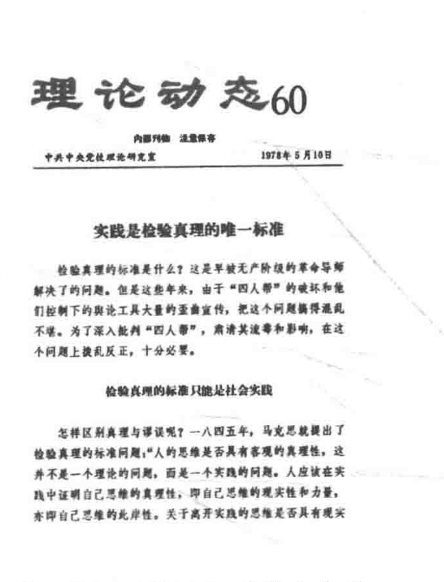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发展却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

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



理论动态60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78年5月10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

★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光明日報

GUANGMING RIBAO

华主席给金主席的感谢电

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到车站热烈欢送

金主席向华主席赠送礼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①]。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实践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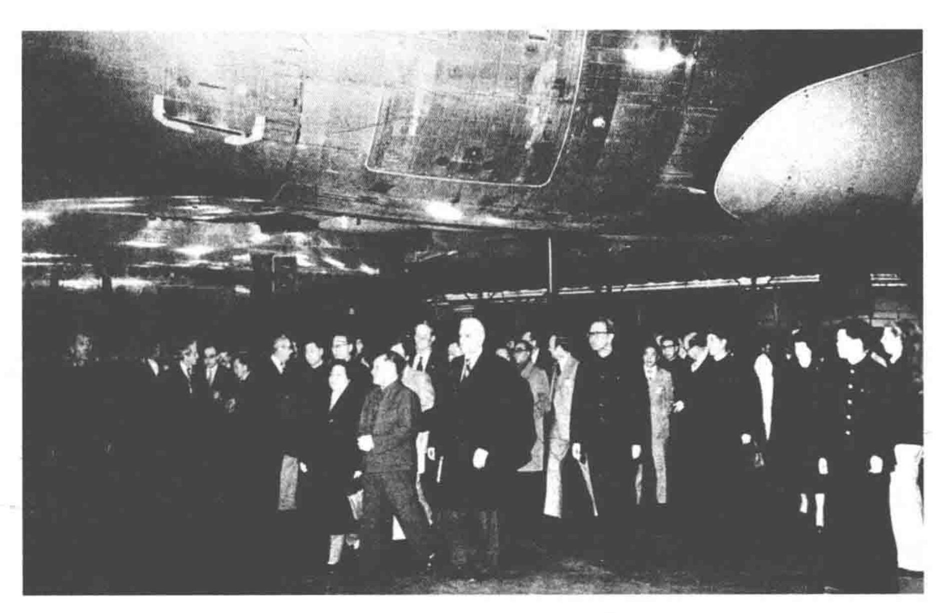
①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



★ 1978年10月24日，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日产汽车公司一家工厂。



★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访美期间参观美国“波音”飞机装配厂。

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

①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刚受到冲击的时候，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认识的邓小平，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提纲手稿。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



★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围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全会还在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决策。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

断。全会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十分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等。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依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已经开始着手克服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前两年出现的冒进问题，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阐发了对外开放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



★ 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些规定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破坏，克服粉碎“四人帮”以来依然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作。全会郑重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①]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二、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全会后，党有步骤地端正指导思想，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

被严重破坏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进行恢复和调整，有力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

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顺利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清理。在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党中央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阐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①]。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是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理论，竭力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制造了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以后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这就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议论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

---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种倾向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后一股思潮混杂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中，反映在像“西单墙”[①]这样的街头大字报中，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个时期，全国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煽动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他们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聚众闹事，阻碍交通，严重威胁着正在恢复中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在党内，一些党员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存在，甚至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正在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给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举行。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深入讨论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3月30日，受党中央委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指出：“三个多月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切，

① “西单墙”指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并进行违法活动。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知，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

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①]

同时，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他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全局的高度，重申并深刻阐述了在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②]。他在批评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错误的同时，着重揭露了某些人借所谓“社会改革”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在讲话中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③]，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话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与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邓小平重申：“以上所说的，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161页。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73页。

③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①]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而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就不能停留在应对迫切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全盘的战略布局和方向，这涉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作为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这些核心内容的基本思想，在邓小平讲话中都有深刻体现，因此，这个讲话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为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科学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排除右的错误干扰，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但这样做，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问题。而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③]。如果党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方向。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作为起草《决议》的主持人，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起草工作之初，他就提出《决

---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③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议》要体现三条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①]。

《决议》讨论稿写出后，从1980年9月起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同年10月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的讨论。这是发扬民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总结。在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一，仍是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鉴于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质，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②]

1981年3月，在《决议》稿进一步征求意见过程中，陈云提出，《决议》应该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的内容。这个建议进一步拓宽了《决议》的视野和立论基础。把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放到党的60年历史中考察，就会反映得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历史依据和认识基础。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

①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3页。

②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强调，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由于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这使党的领导思想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成就、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

—1—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

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第一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十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不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问题才越来越清晰起来。

《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是非，

①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把毛泽东思想的内涵表述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新道路的主要点所作的初步概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深远影响。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通过《决议》的同时，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前，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

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妥善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社会关系，是实现安定团结、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同时，也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大案件进行清理和纠正。1979年2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全国右派复查

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问题。随后，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中划定的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改正。到1980年6月，共改正被错划为右派的达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重新作了安排。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平反等等。

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联合开展的对刘少奇冤案的复查工作，历时一年时间，根据事实，完全推翻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使受到这一冤假错案牵连的近三万人得以昭雪。这一“文化大革命”中最大冤案的平反，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全国共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



★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由此得到解脱，他们放下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曾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得到昭雪。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各方面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他们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其子女成分也一律定为社员。同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接着又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系统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1980年至1981年，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问题会议，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并先后为被错误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同志摘掉帽子。1982年3月，中央印发关于宗教工作的文件，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阐明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政策基础；在此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寺观教堂陆续修复和开放，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党还纠正了侨务问题上“左”的错误，重申党的侨务政策，恢复设置侨务机构，保护和褒扬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鼓励他们为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贡献。

党中央高度重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1981年3月，胡耀邦就知识分子问题作出批示，指出，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按照干部要统一管理的规定，知识分子工作要由中央

组织部抓，中央其他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月23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对科技人员特别是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中年科技人员，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政治上受迫害还没有落实政策的，要尽快落实政策。

为激励并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人才的选拔培养，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1979年11月21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从1979年12月10日起，国务院先后颁发工程技术、农业、编辑、外语、经济、会计等专业技术干部评定职称的暂行规定。1980年2月1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随着各方面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开始呈现勃勃生机。

调整社会关系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彻底纠正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左"的错误，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特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8月15日至9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针等重大问题。

1978年至1979年，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各人民团体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并选举各自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这些代表大会一致号召各自的成员、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根据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全国人民一道，担当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为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为实现祖



★ 1979年10月19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

国统一大业献策出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活动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始恢复和发展。到1981年底，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共发展新成员3.5万多人，建立700多个地方组织，4000多个基层支部。我国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正确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调动了全党同志和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纪律废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还滋生了腐败现象。必须认真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使党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部署，决定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的作风。这次全会上重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担负起这项重要任务。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陈云在会上讲话指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会议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

会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为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各级纪检机关对一批党员违纪案件进行了认真查处。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强调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79年3月，中央决定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向全党公布。经过近一年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基础上，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准则》，并向全国公布。《准则》提出了12条

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强调：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准则》还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作出禁止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禁止领导人外出时（除外事活动）组织迎送、张贴标语、举行宴会等规定。

《准则》总结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使党的规章更加完备，更加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反对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新形势下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准则》公布后，中央纪委在一年之内先后三次召开座谈会，推动《准则》的贯彻施行。各级党委、纪委也都依照《准则》的规定，做了大量工作。陈云在1980年11月中央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①]，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党风建设。《准则》的制定和公布，以及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此期间进行的种种努力，表明了党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强决心。

整顿党风，需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以后，拨乱反正的繁重工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重任，对各级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把干部队伍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中央强调，必须按照德

---

① 陈云：《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0年11月—1984年10月），《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是革命化。

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在拨乱反正中作出贡献的同志先后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使中央领导机构得到加强。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增选王鹤寿等12位老同志为中央委员，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队伍建设迫切需要解决新老合作与交替问题。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反复提醒全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注意培养、选拔合格的接班人，使党的事业能够不断前进，后继有人。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选拔新的优秀分子来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在干部选拔方面的经验教训，下决心在一定时期内，把大批经过实践考验、得到群众拥护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还具体提出选拔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这成为此后全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

1980年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表示自己不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2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在党中央号召下，一大批老干部主动要求离开领导岗位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到1982年底，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已有7260多名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占应离休人数的81%。与此同时，一批经过考验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到1982年6月底，在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领导班子中，新

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66%，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是党为了解决在特殊情况下干部队伍老化，使党的干部队伍接力不断，党的事业持续向前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拨乱反正中各项事业的发展

伴随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摆脱困境，呈现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党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调整政策，采取措施，推动这些方面工作的发展。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代表3000多人欢聚一堂，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探讨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致祝辞。他高度评价30年来我国文艺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文艺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文艺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

为进一步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阐述了文艺与政治、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坚持“双百”

方针和“三不主义”[1]，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导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文艺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

随着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文艺界迅速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一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而被打入冷宫的小说、电影、戏剧重见天日，一批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同极左路线斗争的作品相继问世，大批反映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作品涌现出来。

教育、科学战线的面貌也发生显著变化。1980年1月7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会议纪要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战线的力量，多出成果，多出人才。4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在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管理体制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在计划安排和实际工作中，都应体现中央关于高度重视教育事业、逐步增加教育经费的精神，在财政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一部分教育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以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还决定，从争取到的世界银行贷款中拨出相当部分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

① “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76年至1981年，我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从56.5万人增加到128万人，翻了一番多；共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31797人，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7年总数的1.4倍，其中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首次招生；还向国外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976年至1981年出国留学人数达8180人，接受外国来华学生4000多人。办学形式也日益多样化，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创办了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办法也在一些省市试行。除厂矿企业等基层单位办学外，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也参加办学。这些教育形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学知识、重科学在广大青年中蔚然成风。

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进行空间物理探测获得成功。1982年10月，我国用潜艇在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这两项试验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和空间技术达到新的水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13年的努力，成功实现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使我国在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究方面



★ 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告台湾同胞书》。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党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把实现祖国统一同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在国内加紧经济建设一起，作为20世纪80年代党带领人民要做的三件大事。为了促进祖国统一事业，早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隔绝状态，党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日常管理和军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1980年九十月间组织的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研



★ 1981年9月，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在华北某地检阅进行军事演习的解放军部队。

究班（即“801会议”），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后，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改为“积极防御”。“801会议”后，总参谋部于1981年组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即“802会议”）。北京军区组织实施的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即华北军事演习）是这次集训的重要内容。9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演习结束后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1979年后，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把“消肿”和调整体制编制作为军队整顿的重要任务，多次进行精简整编。1978年继续完成1975年未完成的整编任务。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制度化来解决，通过制度建设解决一系列问题。这次全军范围的精简整编取得显著成绩，到1981年底，军队总人数由602.4万人减少到450万人。1982年，以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为原则，全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这次整编把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番号，所属部队按系统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或所在省、市、自治区，使人民解放军总员额减少到400万人。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武警部队以人民解放军移交给公安部门的内卫部队及边防、消防民警为基础组建而成。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对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及其性质、职能、任务等作了明确规定，并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完全相同。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军队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兵役制度的改革提上日程。1984年5月3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颁布，规定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为了提高战时快速动员能力，中央军委根据兵役法有关规定，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预备役部队。1983年7月29日，我国第一个预备役师在辽宁省锦州地区成立。1986年8月10日，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为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体制，加强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1982年5月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在国防尖端武器研制方面，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大力抓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研制、试验重点科研任务。三项重点科研试验任务从1980年到1984年相继完成，使我国国防现代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边疆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的



★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成就。1979年二三月间，我国边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此后又实施收复法卡山、扣林山作战和收复老山作战，稳定了边境地区局势。人民解放军还大力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铁道兵某师和驻天津某师承担引滦入津重点工程建设，仅用一年零四个月即完成预计三年的建设任务，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济南军区、海军、空军于1984年抽调1.7万余名官兵参加胜利油田建设，承建水库、引黄水闸、新建油港等任务，只用两年时间就优质、安全、高速、低耗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军队培养的军地两用人才，也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大批新生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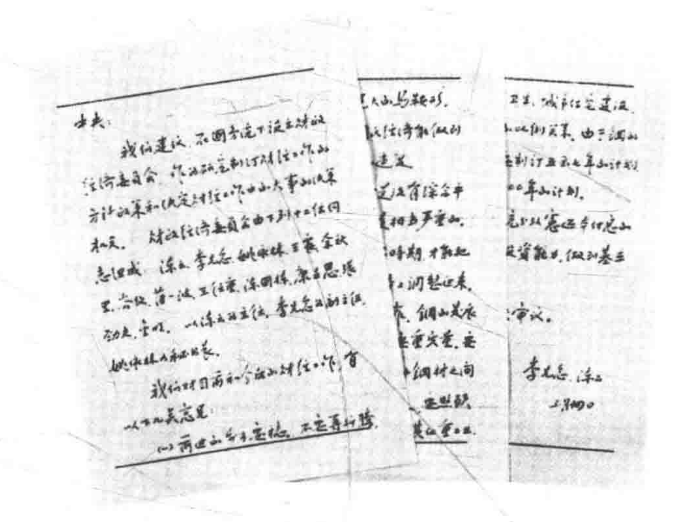
经过艰苦努力，党和国家事业从“文化大革命”之后两年的徘徊前进状态中走了出来，迈上健康发展轨道。许多领域取得重大建设成就，社会生活呈现新的面貌，人民群众因此而取得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增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三、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进行了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调整国民经济

当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时候，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日益显露出来。1978年12月制定的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因生产建设任务安排过大，物资、财政、外汇都有相当大的缺口。1979年初，陈云提出，有物资缺口的计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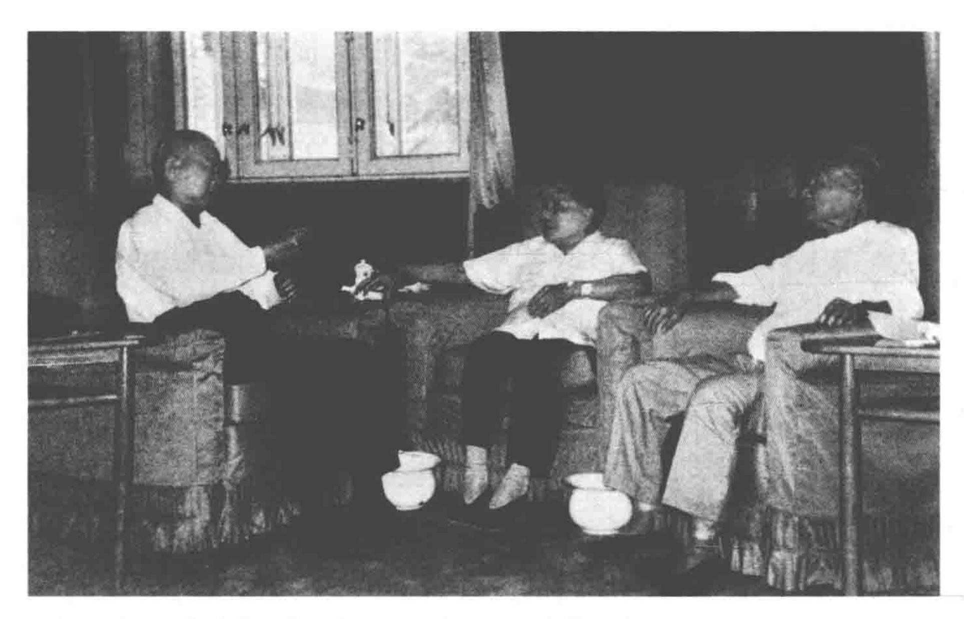
★ 李先念、陈云给中共中央的信。

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①]李先念还说，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新开端[②]。邓小平也多次指出，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再次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作了阐述，强调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

① 陈云：《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1979年3月14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②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在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

比例地前进。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是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的修改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有关指标作了较大幅度下调，主要是降低重工业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速度安排快于重工业的增长；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保持1978年的实际水平。中央政治局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通称为新“八字方针”[①]。贯彻新“八字方针”，是为纠正多年来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偏差和此

① 1960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后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为了区别于此，1979年4月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被称为新“八字方针”。

前两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倾向，以及业已形成的困难。在决定和部署调整过程中，中央明确意识到，要纠正过去那种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从这个角度讲，贯彻新“八字方针”，不但是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步骤，也是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在开始调整经济的时候，邓小平就强调，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也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在调整中，中央还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是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但是，在调整开始时，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大多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和调整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行动迟缓。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纠正过来，在调整中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压下来，财政支出过多和出现巨额财政赤字，能源和交通紧张，物价上涨较快等。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采取坚决措施调整国民经济，1980年11月，国务院召开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深入分析经济形势，决定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12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以争取经济工作全局的稳定和主动，使整个国民经济转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

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进一步总结。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段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必须看到这种困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他还指出，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指出，这次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他还指出，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邓小平在讲话中还强调调整工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了要坚持党的领导。

这次会议进一步清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全党对于实行经济调整方针的紧迫性、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加大贯彻新“八字方针”的力度，国民经济调整的积极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从1981年起，积累和消费、农业和工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国家财政金融状况也随之得到改善。物价趋于稳定。

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调整工作取得的成绩，宣布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根据几年来经济调整的经验教

训，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在调整经济取得成就的同时，党中央、国务院清醒地看到，调整工作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运用行政强制手段、靠紧缩必要开支实现的，因而是不巩固的。此外，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就有必要再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新“八字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党中央明确提出，在整个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调整不仅仅是要解决主要比例关系失调问题，克服眼前的困难，而是要通过调整逐步克服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真正确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建设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调整工作开始时，邓小平即强调：“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①]。所谓解决经济体制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实行突破和改革，并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当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如何正确地实行改革？改革如何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摆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 1979年7月，邓小平在安徽与万里等合影。

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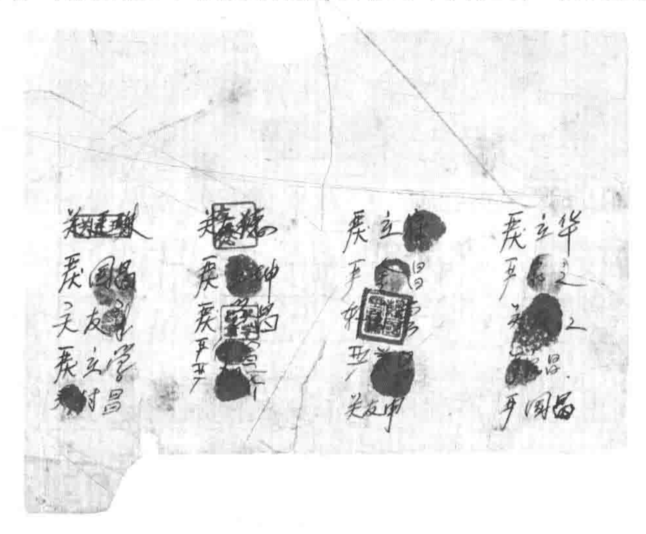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深刻指出："总的看来，我国农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①]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1978年，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面对严重的农村经济形势，有的地方实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已经率先进行改革试验。1978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灾，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下，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出现了全家男女老幼齐下地的景象。这年11月，在借地唤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启发下，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自发地采取了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出“包干



★ 小岗村社员在签订的包干合同书上留下的手印。

到户”，其做法是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最受农民欢迎。四川省委也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的尝试，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虽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强调只有因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一般并不加以提倡，但也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

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①这为鼓舞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经验、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安徽省从1979年1月起，在实行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早的肥西县、凤阳县，允许生产队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工”的责任制。有些生产队则继续进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试验。四川省鼓励一些生产队进行包产到组和“以产定工、超额奖励”的试验，并在全省扩大试验范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推广包产到组的管理责任制。广东省在农村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②的经营管理制度。从1979年1月起，《人民日报》对这些省份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陆续进行了报道，肯定这是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实验。

对于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当时党内外很多人存在疑虑，担心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来信指责包产到组或定产到组不符合中央农业文件精神，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很不利，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为这封信编发的“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读者来信及《人民日报》“编者按”，引起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波动，一些地方甚至对包产到组开始进行纠“偏”。

但是，一些改革实践比较深入的地区，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改革的实际效果出发，继续推进改革，农村面貌越来越显现出生机和活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176页。

② “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工分、定产量，超产奖励。



★ 四川省农民实行责任制后忙于春耕。

力。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贵州省98%以上的生产队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

以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在生产指挥上实行因组制宜，在分配上解决作业组间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如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管理上过分集中的弊病，解决农户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安徽省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简称“双包”）生产责任制引起广泛关注。“双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每个农户的切身利益同完成承包农活的成效结合起来，更有力地调动起每个农户的人力和财力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成效更为显著。在最早实行“双包”责任制的凤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又增长14.2%，许多生产队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由于“双包”责任制效果明显，全国许多地方纷纷仿效，不仅穷困地区的生产队纷纷实行，比较富裕地区

的生产队也开始实行。

在“双包”责任制发展的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谈话，讲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关于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实践，对于打破思想僵化，推动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强调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的同时，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②]。1982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的86.7%。

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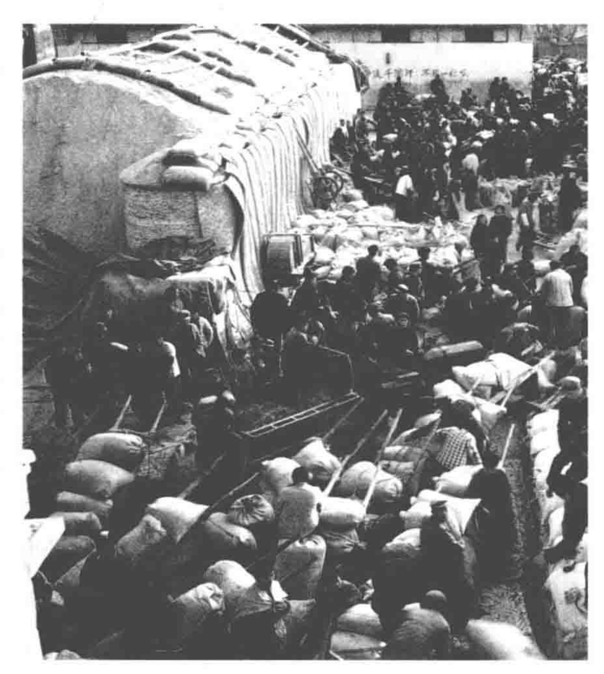
① 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②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与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属、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种制度受到农民普遍欢迎，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成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这是中国农村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方向转变的开始。

农村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允许多种形式责任制并存。同时，全国农村中也有些生产队、生产大队乃至公社，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根据当地的群众要求和实际情况，在过去集体经济基础上继续实行集体经营，但这种集体经营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有的集体经济体制和做法，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进和改革，探索走向



★ 喜获丰收的农民向国家交售粮食。

“高水平的集体化”。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既有体制，触发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中一步一步前行的。农村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极大推动作用。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展开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步骤作了原则规定。会议确定，鉴于在最近几年内，国民经济将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改革要侧重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物质利益挂钩。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要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起来。

早在1978年10月，四川省就确定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宁江机床厂等六家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得到中央的支持。党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试点企业范围。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进

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同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5个文件，用以指导改革，并要求地方和部门再选择一些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6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使企业有了部分的自主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和资金使用权，以及部分的干部任免权等。改革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盈利亏损的情况，增强了企业的经营和市场意识。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则不到50字的广告，四川省宁江机床厂向全国发出“我们这里有机床卖”的信息，迅速使该厂积压的机床成为畅销产品，变产销脱节为双方满意。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为了集中精力搞好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主要在6600个企业中继续进行，试点面不再扩大，以利于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此后，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逐步把改革推向经济责任制和财政体制方面。改革之所以向这方面扩展，是因为国家让利放权给企业，只是改善国家同企业的关系，而企业真正搞活还要在企业内部进行改革，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与之相适应，建立新的财政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成为必要的了。

从1981年春季开始，经济责任制改革首先由山东省在企业中试行。主要内容是通过承包划分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经济责任制改革在增收节支、提高财政收入方面效果明显，因而对全国工业企业产生很大影响。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

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在各工业企业中研究执行。这一文件提出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总的要求是通过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用最小的人力物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此后，经济责任制很快推行到全国3.6万个工业企业。

在这期间，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多收可以多支的新财政体制。这样做，扩大了地方的经济自主权，有利于调动地方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造成中央财政困难、财政预算外资金大幅度增加等问题。

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一样，实行经济责任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的重要一环。它对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济责任制也存在局限性。由于以包利润指标为基本特点，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为承包基数争执不休。有的企业不是努力改善经营、提高效益，而是通过涨价、拖欠或套取贷款来追求利润。滥发奖金问题也未能得到有效制止。从根本上说，经济责任制因未能触及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问题，责权利的划分也就难以规范。

与此同时，商业流通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长期以来，我国流通体制存在着渠道单一、环节过多、产销脱节等弊端。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多渠道、少环节产销结合的流通体制。从1979年起，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重申第三类产品[1]和完成派购任务的第二类产品可以自由上市。1980年又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第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征购、派购、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第一、二类农副产品（除棉花外）都可以自由运销。此

---

①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把农副产品分为三类，分别实行三种收购政策。第一类，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第二类，其他重要农产品，实行合同派购政策；第三类，统购、派购以外的农副产品，可议价收购。

外，还规定供销合作社基层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提倡厂店挂钩、队店挂钩、产销直接见面。对城市商品流通体制主要采取了“一少三多”的改革，即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建立城乡互相开放的新流通体制。这一改革为多渠道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与工业、商业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所有制结构的局部改革。过去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使所有制形式越来越单一。这种情况，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上千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后，国营和集体企业不可能全部安置，他们面临突出的就业问题。从1979年起，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这个方针最初以开辟劳动就业渠道和搞活经济为目的，并取得积极成效。1980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后印转了会议议定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明确提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必须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为此，必须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在新的方针指导下，劳动就业工作有了新发展。许多地方把改善



★ 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干部尹盛喜在政策支持下辞职，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所有制结构同扩大就业门路结合起来，对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放宽政策，鼓励和扶持待业人员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到1980年底，通过兴办各种类型的集体经济，包括街道办集体企业和民办集体企业，吸收了全国城镇651万人就业。当时1000多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后的就业问题，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解决渠道。

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解决劳动就业取得显著成绩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10月17日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对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解决就业问题予以充分肯定，对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意义给予新的评价，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这样，才能搞活整个经济，较快较好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扩大城镇劳动就业。”[①]这一新的概括，提出了我国经济结构应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宏观构想和基本政策思想，正确反映了我国还处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在新的政策思想指引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又有新的大发展，还出现全民、集体和个体联营的经济形式。在广东、福建两省，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营的经济形式也涌现出来。

针对统得过死等金融体制弊端，以改革银行体制为突破口，金融事业快速发展起来。从1979年开始，我国逐步恢复和设立国有专业银行，转变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构建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机构体系，对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取得城市改革的总体经验，从1981年起，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小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这项改革是指对城市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配套改革。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湖北省沙市市开

---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始工业管理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银行体制、商业体制、物资体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科技体制和城市建设体制等10个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1982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省常州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常州市综合改革的特点是以搞活企业、搞活流通为中心，进行工业管理体制、计划体制、劳动工资体制、银行信贷体制、商业体制、外贸体制、财政体制和企业改组联合等11项配套改革。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还在一些省进行了撤销专区行署、由市领导县的体制改革试验。

1979年至1982年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在成效上还仅是初步的。虽然改革对城市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继续改革。

1982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批准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

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实行对外开放，是党根据工作重点转移需要而制定的重大战略，并进而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同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对外开放政策即开始酝酿。党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这些出访带回世界发展的客观情况，促使党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0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实行开放政策……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

定新的政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①]

吸引和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或项目）是具有开拓性的方式和步骤。在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过程中，我国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不断拓宽利用外资渠道，积极探索运用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从1979年起，除了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的形式外，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开展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以及发行国外债券、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等。1979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展国际信托、投资、租赁等业务，并于1982年1月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约合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得到贷款。1980年至1982年，中国先后同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不包括接受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

在各种利用外资的形式中，中外合资经营发展最为迅速。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11月初，邓小平就国家计委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一事答复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邓小平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的六大好处[②]。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现在比

① 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8页。

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①]。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中外合资经营的好处，明确表示利用外资“主要的方式是合营”[②]。1980年5月1日，经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开业。

推动合资经营的关键，是制定相关法律，做到有法可依。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于7月8日施行。1980年7月26日，国务院印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和《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随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合资经营开始在我国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并且对改革开放事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1979年，我国开始以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或向中外合资企业收取场地使用费，助推了改革开放，也开始了变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到1981年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达到48家（不包括经济特区举办的35家）。

此外，这个时期的旅游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迅速站到了对外开放的前列，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创办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早在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派遣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后，就向中央建议，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共同起草《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页。

②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31日，李先念代表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意将深圳南头半岛的50平方公里土地交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区（后实际确定为9平方公里）。同月，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开发建设出口基地。

此后，广东省委提出，广东的对外开放应该先走一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会议期间，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了与广东省类似的设想。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的想法表示支持，同意两省实行对外开放，在计划、财政、外贸、金融方面实行新的体制，要求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如何命名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是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是“投资促进区”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他还针对特区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6月6日和9日，广东、福建两省分别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



★ 习仲勋等视察广东南海县玩具厂。

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①]。中央还原则同意试行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办法，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并确定对两省的计划、外贸、财政、金融、物资、商业、劳动工资、物价等实行新的管理措施。

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之后很快取得积极成效。1980年，广东、福建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7.9%和47.2%；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外汇留成大幅度增长；由于“三来一补”[②]企业发展迅猛，广东新增就业17万人，福建新增就业3万人。在此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资本率先进入大陆，起到了引领作用，加快了广东、福建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有力推动了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明确提出，特区要积极吸引侨资、外资，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经济主要实行市场调节。这个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特区的地位，同时又明确了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

---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② “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

例》。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

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在特区内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和管理体制，即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以求找到一条打破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新路。特区建设资金以引进侨资、外资为主，所有制结构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特区的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实行以国际市场调节为主。特区的产品以外销为主，其所需的设备及原材料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产品要到国际市场上竞争。特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有更大的自主权：除投资规模在1亿元以上项目要报国务院审批，轻工业投资3000万元以上、重工业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要报国家计委审批外，其余项目不需国家综合平衡，特区可以自己审批；外汇实行包干上缴，超额留用；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自主经营进出口业务；进口生产所需的设备、生产资料和自用的生活资料除烟、酒等少数物品外，均免征进口税；对土地使用费区别行业给予优惠待遇。

创办经济特区是一项新生事物，需要在探索中边总结经验边开拓发展。经济特区开发建设一年后，国务院于1981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召



★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者点燃开山炮。

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着重检查、总结试办特区的情况和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经济特区建设显现良好发展势头，迅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改革开放的窗口。

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深刻影响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改变着人们的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党中央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开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制度。邓小平指出，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认识的起点。从这时起，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上重要日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制定这些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

在这些法律中，有的法律保留了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规定，同时也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作了重要修改，有的则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新制定的。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和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组成。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并相应地恢复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和州长、县长等称谓。这就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党政军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体制，恢复了政府机构的职能。新的法律还规定，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个规定，扩大了地方权力，调动了地方进行法制建设的积极性。新的规定还包括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等。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发生的随意侵犯人权的事实，新通过的刑法明确规定，刑法的任务之一是“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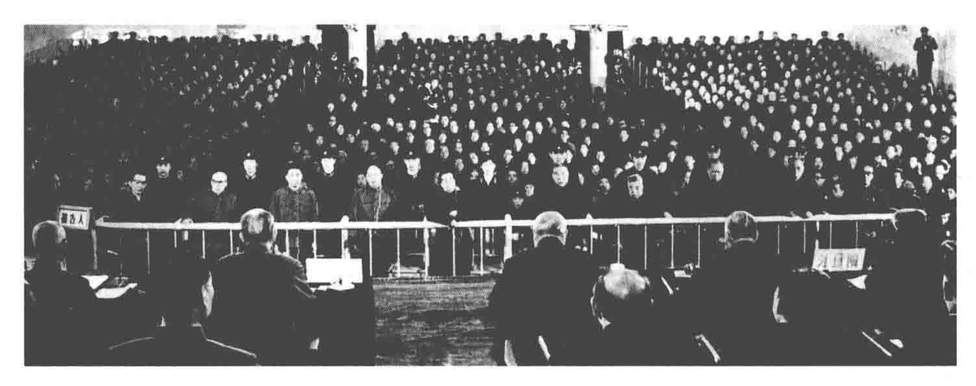
★ 1980年6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进行县级直接选举，回族群众在投票。

外，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师、近亲属、监护人、人民团体或所在单位推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审判中的错误。这些保护公民合法民主权利的具体规定是前所未有的。

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10月1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统战部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在讲话时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同年10月12日，党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国务院各部委和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请示报告》，指出，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各级党委要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克服"清一色"思想，继续切实做好党外人士特别是具有业务和技术专长的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并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判，是民主法制建设引人关注的一件大事。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判。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整个审判过程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①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为准绳，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形成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公正的审判结果，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威严。审判过程通过电视转播，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一次民主法制知识的普及。

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深刻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为主题，专门作了研究部署。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这个党章草案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明确提出了废除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内容。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进一步酝酿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央政治局于1980年8月18日至23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及有关问题。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是因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

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如不认真改革，就不能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过去发生的像“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问题，今后就还可能发生。他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我们只有对这种制度上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才能有利于我国的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还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中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中权力过分集中是现行制度弊端中的总病根。为了革除弊端，他向全党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任务，并着重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六项重大改革措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广大干部群众踊跃购买《邓小平文选》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认真宣传学习《邓小平文选》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开好民主生活会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未来第二阶段会谈十二日在京开始
灵活多样积极有效引进外资
白河堡水库建成蓄水

★ 1983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施[1]。邓小平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为了推进领导制度改革，从1980年10月到1982年，党和政府为逐步革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是实行党政分开，增加地方权力，扩大基层民主权利，切实保障审判、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而享有的审判权和检察权等。



★ 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举行挂牌仪式。

在基层，从1980年起，在少数企业中分别试行厂长负责制和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等新的领导制度。新的企业领导制度，使企业中的党委能够摆脱行政和经济事务，集中力量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初步解决了党政企分开的问题，也使厂长、经理有职有权，建立起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1980年至1982年上半年，还在

① 这六项重大改革措施是：建议修改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设立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划分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真正建立起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四川省广汉、邛崃、新都三县进行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验。1980年9月，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改挂出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①]。

与基层改革同时展开的是中央一级的机构改革。1982年1月11日和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亡党亡国。当然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他还说，这一次精简机构，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进领导班子。1月19日，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随之，党中央、国务院的机构改革迅速展开。截至6月28日，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第一阶段结束。经过改革，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调整为61个，工作人员编制缩减1/3左右。在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国务院领导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新设国务委员10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年多时间里，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稳步展开；实行改革开放，调整国民经济，取得成效，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和国家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这就为党的十二大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

①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面改革人民公社体制。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确立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格局。

四、党的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新的局面。

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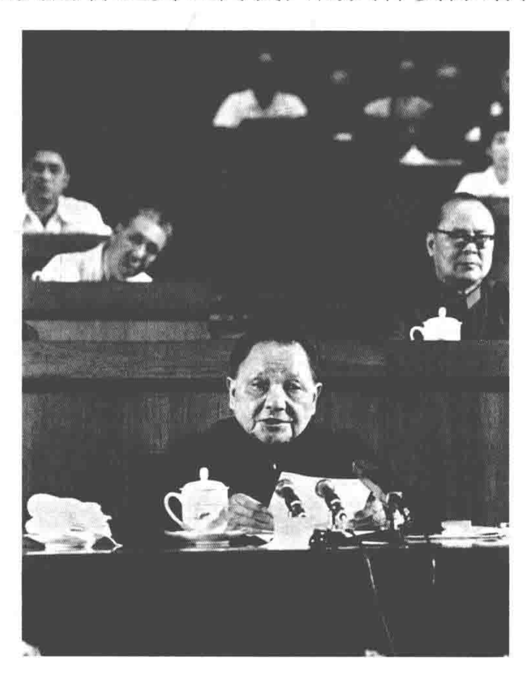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行。大会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的使命是，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



★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提出，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大会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这个总任务，大会对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全面部署。大会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这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问题。大会还实事求是地将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规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会还提出了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的任务，要求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继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政

---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治体制。

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要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大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思想和任务的提出，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

大会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及当前党的建设的任务，制定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符合新的形势的规定。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都更加严格。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由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规定各级纪委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大会

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针对党内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严肃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确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占总数的61%，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171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122人，年龄最小的只有39岁。对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由衷喜悦。叶剑英用唐代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表达对新同志的厚望。

9月12日至13日，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成员。

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以城市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在

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也随之迈出改革步伐。

农村改革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1982年至1984年，中央连续发出3个“一号文件”，不断推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措施。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1984年初，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还可以更长一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在试点基础上，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起9.1万个乡（镇）政府，92.7万个村民委员会。到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这是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

农村改革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79年至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年均7.3%的速度增长，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71亿公斤。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3亿公斤，人均393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是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规定，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业

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为主改为折征代金为主。这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农村改革取得的一个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的前身有相当一部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使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如浙江萧山万向节厂，原为一家不知名的乡镇企业小厂，但在鲁冠球的带领下，凭着机制灵活和技术优势，使该厂生产的汽车零配件万向节跻身于品牌行列之中。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51%，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民观念更新，而且在提供财政收入、发展出口贸易、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苏省无锡前洲乡西塘村无线电厂的电视机装配车间。

农村改革不是采取一哄而起、一步到位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并及时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因势利导，加以推动。这是党指导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比较顺利地实现如

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改革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在沙市、常州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基础上，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试点。从1983年起，国营企业进行两步利改税[①]改革，以完善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这些改革举措，对搞活城市经济、提高企业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要进一步解决经济体制深层次的弊端，还需要把改革全面引向深入。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发出一封公开信，希望给予企业必要的人事权、财权和自主经营权。这表明，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对此作了报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进行的城市改革的试点总的说还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突出表现在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依然存在，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和活力，经济效益低下；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企业缺乏竞争力；分配中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现象。加快改革成为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外开放使人们眼界大开，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经济体制改革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初步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

---

① 1983年至1984年，国家决定对国营企业实行两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采取税利并存制度，即在企业实现的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然后对税后利润进行分成。第二步利改税的主要内容是调整税目和税率，国家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先征所得税，然后根据所得税后利润多少再征收调节税，调节税后利润为企业留利。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穆扎利总理抵北京对我国进行访问
赵紫阳总理主持隆重仪式欢迎贵宾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举行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充分的信心和勇气，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努力夺取改革的全面胜利，为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

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明年九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 198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得出的全新认识。《决定》就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重视经济杠杆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扩大经济技术交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部署。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作为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搞活国有企业，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企业主管部门同企业的厂长（经理）签订任期目标责任制合同，对责权和奖惩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感。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各种税费，实际留利约占20%），使企业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在一些小型国营企业中采取的租赁经营责任制，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有的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尝试。股份制的实行，使企业所有

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给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984年7月，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全国国营商业中率先迈出股份制改革步伐。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本企业和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试行股份制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访华，邓小平把一张刚刚发行上市、面值50元的股票赠送给他。这一颇有象征意义的赠送表明股票和股份制并不为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同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提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股份制企业6000余家。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也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芜湖个体经营者年广久，一个自称"傻子"的人，炒的瓜子香脆可口，生意越做越红火。到1982年，他的工厂已雇用100多人，远远超过当时个体户雇工8人以下的界限，有人主张取缔。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①这个明确表态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打消了人们对发展个体经济及多种经济成分的顾虑，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在浙江温州市，1985年全市登记发证的个体工商户超过13万，家庭作坊遍布全区。温州人生产的皮鞋、眼镜、阀门、打火机、服装、文具笔、印刷品、锁具、变压器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成长起鞋王、笔王、锁王等一批私营企业家。温州是这一时期我国个体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迅速、最具活力的城市。

改革使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发生很大改变。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198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有相当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

①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7%。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到38.6%，集体商业由43.3%下降为35.7%，非公有制商业由2.1%上升到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569万人。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扩大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在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和改进。与改革前相比，1987年由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17%；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76.6%下降到31.2%，由银行筹集的从23.4%上升到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在改革价格体系和促进市场发育方面，不仅消费品市场稳步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以及金融、技术、劳务和房地产市场等都得到进一步开拓。在价格体系中，除国家定价（平价）及国家指导价（浮动价）外，由市场调节、价格完全放开（议价）的商品及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双轨制”现象，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紧紧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城市改革在财政、税收、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虽然在着重强调放开搞活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

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科技体制改革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科学家向中共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提出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政协六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闭会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进一步完善继承法草案

★ 1985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863计划”的四位倡导者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右起）在一起。

源技术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重点。该计划后被称为“863计划”，其实施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也先后于1985年、1988年付诸实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及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多种运载火箭和卫星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成果相继诞生。

教育体制改革也正式启动。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为此，要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决定》发布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特别是通过扩大办学自主权，激发了地方和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多，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各级各类教育都得到发展，中等教育结构得到调整，职业教育得到加强，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得到扩大。成人教育向多功能、多规格发展，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六一儿童节前夕
胡耀邦赵紫阳王震陈慕华
向少年儿童赠送礼物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 1985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开设了许多短缺专业。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从1985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分配实行计划分配与双向选择相结合。

随着各方面改革的陆续展开和推进，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冲破，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改革、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党的十二大以后，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规模和水平大幅提升，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

经济特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从1980年到1984年底，广东、福建两省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亿美元，占全国的40%以上，五年中工农业生产平均递增9%以上。但特区在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走私贩私的严重情况，引起了对经济特区的责难和非议。在特区建设艰难推进之际，邓小平于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和广州、上海。在珠海，他提笔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题词，后又为深圳补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到：“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①]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和对特区的肯定，使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机遇。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

---

① 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在此之前，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邓小平谈话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3月至4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开放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问题。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优势、扩大对外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决策和重要步骤。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央于1985年1月召开长江三角洲、珠

① 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 邓小平等接见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代表。

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对外开放初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初步形成，促使我国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品出口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进一步增强。到1987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10350项，累计协议金额625.0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等达257.73亿美元。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技术改造项目5000个，成交额34.5亿美元，推动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和结构调整，并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发展了一批新产品，有的还填补了国内空白。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六五”计划的完成与“七五”计划的制定

党的十二大后的几年，特别是其前两年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成效显著，集中体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上。

“六五”期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和根本前提。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制定的计划切合实际，加之通过前几年的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的经济指标全面和超额完成。1985年同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7707亿元增加到1333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国内生产总值由4552亿元增加到9040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7%，远远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国民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效率有所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由“五五”末期的连年下降转为逐年上升，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五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五五”时期增长46%，完成技术改造投资增长77%。“六五”期间，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新局面，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五五”期间增长1倍，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高。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1983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238元提高到31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7.6%。“六五”计划经济指标的完成，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粮食、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由于日用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这些成就和变化，同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比，是很

突出的。

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社会发展摆到突出位置，是“六五”计划的一个鲜明特点。以往的五年计划都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从“六五”计划开始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用较大篇幅对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作出安排，包括人口、劳动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城乡建设、社会福利、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社会秩序等。这是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重大进步。在人口政策上，经过长期酝酿和实践，党的十二大明确把计划生育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这一政策的实行，保证了人口增长同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对提高人口的质量和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环境保护开始受到重视。1983年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环境保护内容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六五”期间，在制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控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解决突出污染问题，防止新污染发展，改善北京和杭州、苏州、桂林等一批重点风景游览城市环境状况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六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成效不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发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农业生产中出现重副轻粮的倾向；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滥占耕地现象严重等。这些问题，有的是旧体制留下的老问题，有的是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都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完善体制机制，来逐步加以解决。

随着“六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党中央从1983年开始着手进行制定“七五”计划的准备工作。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和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七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1986年4月，这个计划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后实施。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政治体制改革在探索中稳妥推进，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修改宪法的工作提上日程。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宪法修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彭真具体负责宪法修改工作。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纠正1978年宪法中存在的缺点，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定。新宪法的通过，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2年宪法正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序言部分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回顾，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



★ 1982年12月，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们投票表决宪法草案。

事业的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确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重要原则。1982年宪法在结构上还作了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调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1982年宪法对国家机构设置作出许多新规定。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原来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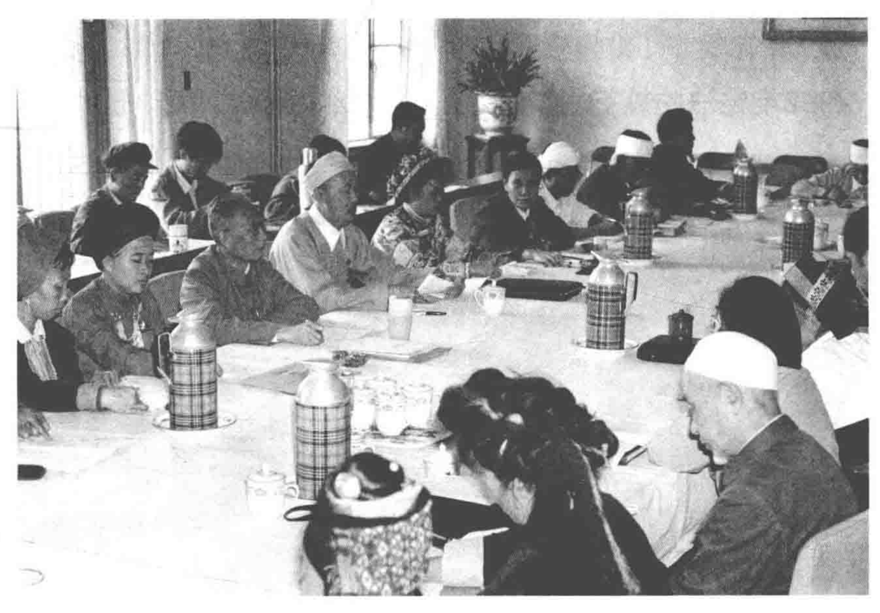
★ 198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除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二是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副主席。三是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在国家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不变。四是完善国务院领导体制。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新增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五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省、直辖市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六是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镇）政权。七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以上这些新规定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增加了新内容。

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

字方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大幅度增加。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从第五届的60%减少至40%。非共产党人士在全国人大的代表所占比例，第五届为27.2%，第六届上升为37.5%；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的比例，第五届为25%，第六届则为50%。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还在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1982年宪法恢复1954年宪法的正确内容，并作出一些新的规定。主要是：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根据新宪法的原则，198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同年



★ 1984年5月，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

10月1日起实施，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随着新宪法的施行，基层民主建设大步推进。全国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进一步健全，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逐步建立。自1980年2月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农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后，到1985年底，全国共建立村民委员会约94.9万个。根据1982年宪法确立的村民自治原则，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根据1982年宪法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的规定，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城市居民委员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逐步形成。

1982年宪法的施行，推动法制建设加快步伐。六届、七届全国人



★ 1987年4月11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大期间，共审议通过法律96部。立法的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适应现代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的法律，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二是制定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法律，具有代表性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在我国开"民可告官"先河的行政诉讼法。在执法方面，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等认真履行职能，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危害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活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行动，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保障了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全国范围的"一五"普法活动在1986年全面展开，其后根据新的形势每隔五年制定一次普法规划，更新普法内容，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加强和深入。

以制定1982年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进阶梯，同时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环境，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广泛开展起来。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出，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学校的少先队员走上街头宣传新风尚。

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活动。2月28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人民解放军也根据自己的特点，开展了“四有三讲两不怕”[①]的教育活动。

1982年2月，党中央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倡导开展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从3月1日开始，活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以后其内容除“五讲四美”外，又同“三热爱”活动紧密结合，“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并设立了相应办事机构。3月30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成立，指导、协调、监督全国活动的开展。1984年以后，“创建文明城市”及军民共建文明村镇、文明街道等活动在全国比较普遍地开展起来。媒体相继报道了模范共产党员蒋筑英、罗健夫，活雷锋朱伯儒和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等人的事迹。“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开展，对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抵制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

---

① “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 1983年，张海迪在出席全国青少年学雷锋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座谈会期间同代表们交谈。

想文化的错误倾向，反对企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强调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

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搞好这项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①]。1987年3月，邓小平又说，不仅要讲十年到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②]。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党的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同意接受他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

①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② 邓小平：《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标志着党开始用一种新的思路指导自身建设。党的事业与党的建设紧密相连，围绕这个目标，党在健全民主集中制、推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等方面，采取新的举措，推动党的建设出现新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制度、党的监督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作出六项规定，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遵循，对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保证全党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差、普遍老化的状况，越来越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为此，党的十二大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用以指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十二大以后，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得到使用，8万多名有知识、懂业务、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以上各级领导岗位。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64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91名经过考验、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使中央领导层在年轻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有力推动了干部新老交替和干部队伍结构的改善。

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根据十二大的部署，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从这时起，在全党分期分批开展了一次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

务的全面整党。1987年5月，整党基本结束。这次整党主要采取党员集中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党员觉悟，解决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问题。经过整党，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加深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各地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各级党组织通过认真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种人”[1]，使党的组织进一步纯洁。总的来看，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和纪律松弛的状况有了改变和进步。但是，整党工作开展得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没有全面完成整党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

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保证了党始终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五、党的十三大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

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的回答。

党的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① “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党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

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便开始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分析以往发生失误和曲折的原因。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这已经初步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此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重申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党的十三大在以往认识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使党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大会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作了系统阐述，指出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正确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认识出发，大会把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动摇，是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对加快和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大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大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意义，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

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和概括，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同时，大会也清醒地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以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

大会首次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1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200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69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仍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伴随改革开放实践逐步形成的，也是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步骤的战略构想提出来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党就提出了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战略构想。“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的发展战略，成为世人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思考的是到20世纪末我国要实现的战略目标问题。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①]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

① 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实践证明，“三步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正确战略。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

按照党的十三大的部署，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制定的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提出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同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开始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同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两权分离”的改革原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将企业的责、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沿海地区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劳务费用低、加工技术较高、对外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有效地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信息和销售网络，加快经济发展。1988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

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5月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给予海南经济特区更加灵活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海南设省及把海南岛设立为经济特区，体现了中央加快改革开放的魄力和决心。

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深化，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方式。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的任务。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机构改革随之全面展开。经过这次改革，国务院机构总数由72个精简为66个，人数由5.28万人减少为4.48万人。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转变。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迈出重要一步。党的十三大把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提出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凡进入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应当通过考试，公开竞争。由此，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国家人事部，这既是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又是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职能部门；开始筹建国家行政学院[①]，其主要目标和功能是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和培养高层次行政管理及政策研究人才。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始起步。1986年，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并专门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000多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从无偿、无期限、无流动变为有偿、有期限、有流动改革的序幕；11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福州等地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

① 国家行政学院经筹建于1994年9月正式成立。

土地的使用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土地拍卖。

环境保护机构和立法逐步建立健全。1984年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1988年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政府也陆续成立环境保护机构。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①]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八项环境管理制度。同时，以1979年颁布试行、1989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为开展环境治理奠定了法制基础。

在全面改革的推动下，加上经济发展周期处于上升阶段，1984年至1988年五年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创造的工业总产值达6万多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3年的564.6元增加到1988年的1180.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309.8元增加到1988年的544.9元。居民消费水平由1983年人均315元增长到1988年的684元。城乡储蓄存款由892.9亿元增加到3819.1亿元。

治理整顿的开始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间，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短时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有些则是这几年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在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作为价格改革过渡措施的价格双

① “三同时”，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轨制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1988年比1983年，国民收入增长超过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23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1%。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和收入下降，而工业投资增长过快，摊子铺得过大，又加剧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1984年至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22.6%下降到15.6%，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1985年至1987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以8.8%、6%、7.3%幅度上涨。198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发行最多的一年，这年1月至10月，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6%。上述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对于一开始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党和政府力图探索新路子加以解决。为防止急刹车引起的损失和震动，1985年初，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即用比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1985年2月至10月，国务院先后四次召开省长会议，以解决消费基金增长过猛、信贷规模过大、外汇使用过多以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问题，主要措施是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放。这次“小调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地方和企业投资尤其是非生产性投资、消费基金尤其是集团购买力压不下来，主要压缩的是企业流动资金，引起经济增长“滑坡”，反而影响了供给。鉴于此，政府不得不适当放宽货币控制。

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夏季不适当地决定进行“价格闯关”，全面推进价格改革，放开价格。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准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

题[1]。尽管这个改革方案没有正式实施，但中央政治局通过方案的消息公布后，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高通胀预期，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物价问题已不单是经济问题，已经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1988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这个方针与《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相比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从加快改革步伐转向其后两年以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重点；二是强调价格改革不能孤军突出，改革必须是全面的配套改革。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为此，全会要求1989年大幅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体相当于1988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1989年的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

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全会要求坚决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的行为；整顿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认真解决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多头和多环节经营的问题，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准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加强宏观监督体系；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

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要进行全面的配套改革。全会指出，不理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不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在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中，应

① 《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人民日报》1988年8月19日第1版。

当特别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价格“双轨制”是我国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明显低于1988年，此后几年每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控制在10%以内，这是衡量我国价格改革是否积极而又稳妥的一个尺度。某些重要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双轨制”不可能也不应当在短期内取消。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为贯彻全会精神，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等指导性文件。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夺取明年农业丰收的决定》。在1989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作了《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

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原来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但国民经济发展的难关尚未渡过，一些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

六、外交、国防战略的调整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赴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在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向美国社会各界介绍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还签署了一系列协定。这一重要外交活动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



★ 1979年初，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

外交政策的调整

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重大调整。这就是明确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一如既往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之外，还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此，党和政府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一时期，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不同看法，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的观点。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

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①]他还明确提出“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②]。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虽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未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中，苏联日渐处于衰势，多次提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为争取和平、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③]。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



★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页。

③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①]。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报告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②]。后来，这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到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③]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④]。

这两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

①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②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③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④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8页。

转变，有利于使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①第二个转变，则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②"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③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这表明，中国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



★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

② 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③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使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1989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达到137个。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在发展同朝鲜、巴基斯坦等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重视妥善处理与一些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注意严格区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和发展。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四项原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厚的经济基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

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之一。尽管因售台武器等问题中美关系曾受到严峻考验，但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两国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两国间的各层级交往有所加强，经贸、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文化交流逐年增加。中苏两国从1982年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几个障碍基本解决，两国关系逐步好转。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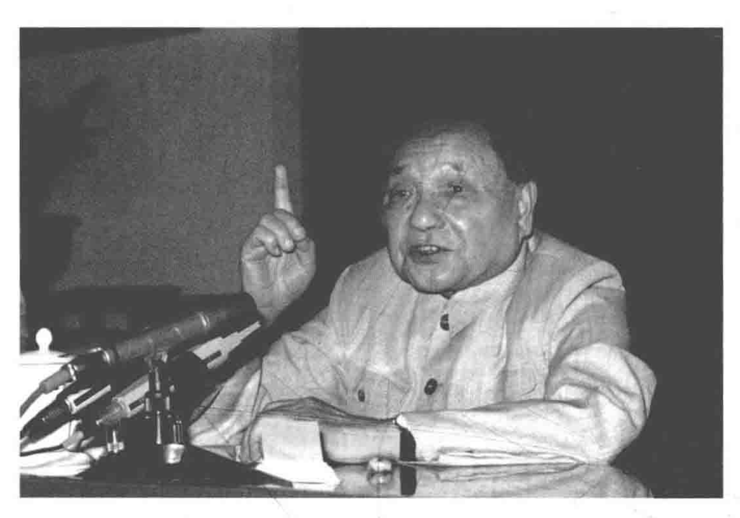
经过对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随之发生转变。1985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要求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走精兵之路，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成功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为了适应上述战略性转变，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改

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本目的，是要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精兵。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将大军区数量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7个[①]。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都在原定额基础上精简近一半。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撤并部分其他院校。保留陆军的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将装甲兵部队全部，炮兵、高炮部队大部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序列，有的增编了电子对抗分队，有的还组建了陆航团。陆军集团军的组建，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的重要一步。



★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为机遇，军队的全面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198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指导思想，提出加强以思想、纪律为重点的思想教育等8个方面的内容。1990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基层建设纲

① 调整后大军区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 1988年9月14日，17位解放军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

要》。各地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发展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1988年7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这一《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构成新时期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的重要标志。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授予17名军官上将军衔。10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全军更换新的制式服装。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斗争中作出新贡献。在中越边境，继1984年收复老山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老山坚守防御作战。1988年3月14日，我海军舰船对窜到我赤瓜礁海区进行挑衅的越南海军舰船进行还击。这些自卫还击作战，保卫了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了国家尊严，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的形象。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过紧日子，克服诸多困难，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此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



★ 新疆军区某师官兵在西部边疆荒漠戈壁引水工程的建设中，顶着风沙回填引水输水管线。

解放军主动为国家排忧解难，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和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等为地方建设服务；全军医院和大部分服务设施向地方开放；军工企业走军民结合的道路，积极发展民用产品生产，1980年至1992年民用产品的产值年均以20%的幅度增长。这些举措和行动，都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还积极担负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任务。1987年五六月间，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空军部队为扑灭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特大森林火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与初步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

“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美建交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解决台湾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会考虑台湾的实

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①]。1979年1月1日，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②]这九条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③]。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为国家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② 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页。



★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根据“一国两制”构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主要内容是：“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①]这六条方针，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使其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一国两制”构想虽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租期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新界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香

① 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港的能源和主要工业都在这里，离开新界，香港岛和九龙无法单独生存。1979年，新界租期还有18年即将期满。由于面临新界土地契约能否跨越“九七”，投资者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此时提出了香港未来地位问题，试图借中国百废待兴之机向中国施加压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邓小平表示不能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以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建议。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中国政府对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强调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并说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



★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产生灾难性影响，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①]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按时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定了



★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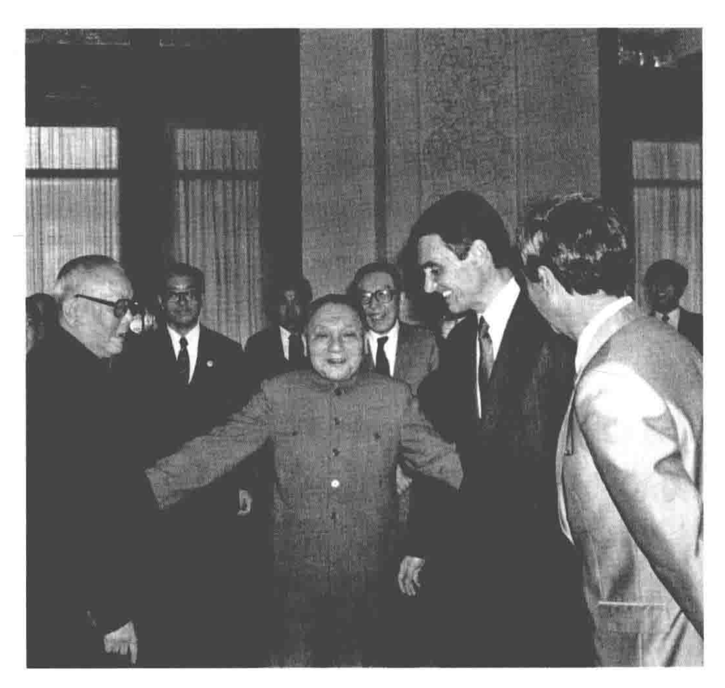
① 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下来。

1982年10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4年9月，中英双方在中方政策基础上达成协议。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此，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

香港回归进入过渡期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当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成为我国和平统一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历史问题。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谈



★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判比较顺利，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香港、澳门回归进程的启动，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

七、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形势复杂多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不断加剧；西方国家政要扬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中国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滋长蔓延；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显现。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走到一个重要关头，党和人民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1989 年政治风波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的时候，1988年末至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极少数人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焦虑，以及对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在中央举行悼念活动期间，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但也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利用大小字报和标语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蛊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发生聚众冲击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在西安、长沙、成都等城市发生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犯罪活动。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事态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从5月13日起，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学生进行绝食，占据天安门广场。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新闻媒体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受到严重干扰。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迅速结束动乱。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动乱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此后，北京和其他

大中城市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①]。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严重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因而产生"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乘机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使我国国内一些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政治风波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社会思潮煽动起来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却未能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

邓小平对不安定因素始终保持高度警觉。1989年初，他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

---

①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3月4日，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的谈话中特别提醒说："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①]学潮发生后，4月25日，邓小平在同李鹏、杨尚昆的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了事件的性质："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②]邓小平的谈话为处理动乱确定了正确方针。

政治风波的发生，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提出了两个需要人们正确认识的问题：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即"三步走"），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二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走哪条道路的根本问题。对此，邓小平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没有错，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我们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2—1273页。



★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①]邓小平认为，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邓小平要求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政治风波后中国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政治风波的发生，暴露了中央领导层存在的问题。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分析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性质及原因，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对

①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

全会审议并通过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①]。全会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

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江泽民在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②]这一鲜明的政治宣示，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理解、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

---

① 1989年6月29日至7月6日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② 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 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发表讲话。

治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所作出的表率，全会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几十年

革命生涯建立的卓越功勋，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邓小平强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当务之急要抓三件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同时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

针对一部分党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政治风波的问题，党中央认真抓了清查、清理工作，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1989年秋冬和1990年春，各级党组织对在政治风波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进行了清查、清理。其后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中央和地方单位的375万党员中进行了重新登记工作。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从1989年底开始，至1990年6月基本结束。在党员重新登记中，对少数不合格党员进行了妥善处理，对违纪党员进行了纪律处分。同时，中央还十分注意对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尤其注意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并对优

①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江泽民告诫全党，如果不提出并解决这个任务，党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后备队，就不可能胜利地走向未来。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长久地坚持和发展下去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

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中央提出，为了帮助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是非，把握正确方向，要着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今后，凡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其他领导成员也要定期到党校接受轮训。

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作斗争。总结政治风波的教训，党严惩腐败的决心更加坚定。邓小平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①]。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②]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在制止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即：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是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些惩治腐败举措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

① 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② 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经过对政治风波的反思，党对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提出应从七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即：坚持群众路线，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利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党内普遍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为全党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出表率。各级党政机关也制定了相应措施并贯彻落实。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纪案件，并进一步提出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认真清理党政干部违纪违法建私房和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两个问题。中央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

针对政治风波中暴露出的党的领导受到削弱的问题，党决定在领导体制上进一步调整党同国家政权机关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同月，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0年3月18日，江泽民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作《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讲话；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这些文件和讲话都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基本制度决不能动摇，任何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政治组织都不能背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必须继续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主要包括：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监督和协商的作用，并对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途径、程序和原则作出较过去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被撤销的党组又在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中陆续恢复。

在大力抓党的建设的同时，思想战线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得到加强。

邓小平在分析政治风波发生的原因时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克服“一手软”的问题。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强调全党要重视和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1990年至1991年，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重视。思想教育制度和工作方法得到恢复和改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以及遵纪守法的教育得到加强。此外，还开展了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学习英模人物的活动。

党重视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提出，高等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于在政治风波中参加过游行、绝食的青年学生的处理，邓小平在1989年9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说，我们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他请李政道转告他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绝大多数的人会清醒过来，学生思想也会

清醒过来[1]。10月31日，邓小平在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态度。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广胸怀和对青年学生的关心爱护之情。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氛围发生了积极变化。

针对社会上刚刚出现的对知识分子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误解，1989年9月8日，李鹏在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这一基本估计不会因这场风波而改变。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71周年报告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厚望。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必须把知识分子工作放到重要日程上来，努力解决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党加强了对新闻舆论战线的领导。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做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反对绝对的新闻自由。会议提出了“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注意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在此前后，加强和调整了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对发生政治方向错误的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学艺术团体等，有领导地进行了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

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促进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政治条件。

应对国际风云变幻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

① 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潮，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面对复杂严峻的局面，党中央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战略策略方针，处变不惊、妥善应对，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了考验。

1989年6月，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和攻击，并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7月，西方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会议追随美国宣布对中国采取中止高层政治接触、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

面对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邓小平及时指出，“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他强调：“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①]中国党和政府以各种形式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明确宣告：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按照党确定的正确方针，中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孤立中国未必于自身利益有利。1989年7月至12月，美国总统布什两次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来华进行沟通。

当中国政局稳定下来的时候，国际局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从1989年下半年起，在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11月，被视为冷战时代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在中东地区，伊拉克突然出兵侵占科威特。1991年初，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取得压倒性胜利。接着，苏联局势出现急剧变化，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1991年底，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

---

①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阵营不复存在，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结束。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对于如何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①]对于苏东剧变，邓小平强调，无论苏联内部发生什么变化，都要稳定中苏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②]。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方针，党中央对国际形势作出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尽管目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充满各种矛盾，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根据这一判断，中央明确提出，要继续执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为扭转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确定了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几十位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访问。经过努力，中国不仅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得突破。1990年至1992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印关系有了

①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②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很大改善，中国还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以及苏联解体后新建立的国家[1]等2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54个。中国还成功争取到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中国不仅没有因西方国家的“制裁”而被孤立，而且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制裁”对制裁国本身也不利。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并不一致。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使两国关系陷于严重困难。在中美关系最困难的阶段，中国领导人严正指出，中国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同时，中方继续以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积极同美方进行沟通。海湾危机爆发后，为得到中国在海湾问题上的支持，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善两国关系。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两国关系虽仍处于低谷，但双方高层一直保持着接触，美国的对华最惠国待遇也没有中断。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往出席。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由此结束了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艰难的时期。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有效应对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种种外部挑战，中国外交更加坚定地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

---

① 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

治理整顿的成效和“七五”计划的完成

经济发展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好。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认真分析面临的经济困难，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确定在前段时间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1989年算起，再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全会要求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状况，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提高效益基础上保持5%至6%的年增长率，改善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措施。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进行。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治理整顿取得了较好效果。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国民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供求平衡矛盾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缓解，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的涨幅从1988年的18.5%回落到1991年的2.9%。商品供应充足，部分商品出现买方市场。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态稳定，市场销售趋向基本正常。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进出口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中国的外经外贸仍取得较大进展，出口以年均14%以上的速度增长，进口自1991年开始回升。根据这种情况，1992年3月，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宣



★ 1990年8月22日，江泽民点燃第十一届亚运会火炬。

告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尽管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到1990年底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七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0%，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4%，国民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0%，都超过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8%，超过4%的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2%，超过7.5%的计划指标，是继“一五”和“六五”之后的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工业生产能力扩大，技术水平提高，主要工业产品平均年产量都比“六五”时期有较大幅度增长。教育、科技和各项社会事业获得进一

步发展。“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和“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发射成功，五兆瓦低温核供热试验堆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大秦线万吨级组合列车运行试验成功等，标志着我国又一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我国还成功承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治理整顿期间，改革开放没有停顿，在某些领域还取得重大突破。

农村在巩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得到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改善外部环境、转换内部机制的措施，并继续扩大实行股份制、租赁制试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贸企业逐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促进了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价格改革成功迈出重要步伐。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形势出现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持续几十年的卖方市场第一次转向买方市场，给价格改革带来难得机遇。党和政府抓住机遇，及时推出价格改革重要举措。1990年国家相继调整糖料、油脂油料等收购价格，提高煤、电、油、运价格。1991年先后提高原油、钢铁、铁路货运和统配煤炭等的价格，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价格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粮油统销价格的调整。1991年5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三种粮食和六种食油的价格，食油实现购销同价。1992年4月1日，国务院再次决定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粮食购销同价。到1992年底，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比重从1987年的50%左右扩大到80%左右。这次价格改革虽然没有像先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但实际推动力度很大，悄无声息地逐步实现了价格并轨。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标志性的举措是证券交易所的建立。1990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



★ 1990年12月，上海市民为办理股票账号登记手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前排起长队。

易所正式开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易的开端。沪、深两个交易所的成功开业及期货交易机制的引入，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将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的强烈信号。



★ 浦东新区夜景。

对外开放方面的重大举措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浦东是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海最繁华的外滩的一块三角形地区。这片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土地，长期以来却没有被开发。冷清、落后的浦东与繁荣的浦西形成鲜明对比。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于1990年4月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这一决策不仅催生了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在长江出海口的崛起，促进了上海的迅速发展，而且对长江三角洲以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强大的辐射效应。

当“七五”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提出，今后十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更重要的发展阶段。全会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基础上，确定了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方针。《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作了概括，提出了12条主要原则，这12条原则的概括，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建议》还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经1991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后付诸实施。

治理整顿任务和“七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八、邓小平南方谈话

治理整顿的结束和“七五”计划的完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90年和1991年，党中央在积极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在思考和研究加快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

这时，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是复杂的。随着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既是重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一方面，在多极化进程中，我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回旋余地增大。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我国加



★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入全球性竞争与合作格局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这样，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影响90年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十分关注推进改革开放问题。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对改革开放的责难，邓小平强调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强调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讲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实质就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谈话中，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 1992年1月23日，在前往珠海的快艇上，邓小平指着广东地图对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在这一系列的阐述中，被鲜明地提了出来。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的重大问题之一。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他还强调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经验，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还强调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认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阐述了其他一些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



★ 1992年2月7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南浦大桥。

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低潮，邓小平满怀信心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92年2月28日，党中央将邓小平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就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作出部署。国务院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迎接党的十四大的召开，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在谈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还列举了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几种新提法，并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篇讲话为十四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达到了新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第十章

改革开放新阶段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

本章提要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实践表明，只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够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进。

一、党的十四大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①]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中国共产党不仅使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丰富着它的理论和实践。

党的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着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江泽民的报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任务，阐述了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作出了战略部署。

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

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



★ 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遇，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力争国民经济在讲求效益的前提下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和可能的。因此，大会对我国在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作出调整，从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至9%；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大会还对加快经济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了必须努力实现关系全局的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大会报告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大会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

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89人、候补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08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作为大会特邀代表的邓小平没有出席会议。19日下午，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与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一起同出



★ 邓小平同江泽民等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

席党的十四大的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代表们的掌声经久不息，表达了对这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敬意和热爱之情。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纲领的制定与实施

按照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同时抓紧制定总体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经过广泛深入的专题调研，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决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也借鉴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回答了改革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新的突破，思想性和指导性都很强，是继续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和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改革的重大决策同步进行的。《决定》所规定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是对已经酝酿成熟

的改革方案的确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国务院分别于1993年12月15日、12月25日和1994年1月11日作出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加强中央银行的职能，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分开以及汇率并轨，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以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为方向，将外贸进口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这为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准备了条件。

根据《决定》精神，1994年还推出了其他许多改革措施。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按照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和各类建设项目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不同的投资方式，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投资融资领域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计划体制改革，主要是进一步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计划为主，突出国家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把重点放在中长期计划上，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作用。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调高粮食、棉花、石油、煤炭等基础产品价格，进一步理顺比价关系，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由“双轨制”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价格调控体系。

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商品化，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关系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80年代的房改经历了公房出售试点、民建公助建房试点和提租补贴试点，在实践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90年代初期，全国房改工作开始加快。1993年，全国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开始着手起草《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以国发〔1994〕43号文件下发执行。与以往的房改方案相比，1994年的房改决定在正确处理国家、单位和个人利益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出售公房和建立公积金制度两大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并且详细规定了具体政策。

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为了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从1994年底开始，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要求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后，全国各地先后选定了27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务院还选择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

通过上述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这就为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济发展实现“软着陆”和“八五”计划的完成

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方针指导下，1993年我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524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3.9%。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继续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4565亿公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重点工程建设加速，京九、南昆等重要铁路干线建设进展顺利，高等级公路和重点港口建设加快。邮电通讯状况迅速改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9.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城乡居民存款总额在年末达到15204亿元，比上年增长29%。

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同时由于旧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健全，以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猛，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交通运输紧张，产品库存增加；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造成投资失控、金融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早在1992年，党中央就一再提醒全党，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这年4月初，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出

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①]。10月，中央召开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强调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

1993年4月，中央再次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讨论解决乱集资、乱拆借、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等问题。5月9日至11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19日，他又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提出要抓紧时机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否则解决问题的重要时机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②]。在此前后，国务院相继就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问题发出通知，并派出7个工作组分赴14个省区市进行检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6月24日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

为确保宏观调控措施落实到位，江泽民于8月25日至27日在大连主持召开华北、东北八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令行禁止，确保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9月27日至29日，他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西南十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既要有紧迫感，不丧失发展的时机；又要尊重客观规律，量力而行，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大的损失。国务院再次派出7个工作组，分别到14个省区市的工厂、工地、开发区、商场进行实地察看，检查计委、银行和财政部门的工作。7月上旬和下旬，国务院相

① 江泽民：《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1992年4月4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页。

②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继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约法三章”。金融系统的“约法三章”是：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财税部门的“约法三章”是：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运用经济、法律手段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把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一是过度投资得到有效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62%降为1996年的14.8%，达到比较正常的增长幅度；货币发行量随之减少，基本实现了调控目标。二是金融秩序迅速好转，信贷规模总量得到控制，制止了乱集资、乱拆借等现象。三是物价逐渐放开且涨幅明显回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从1994年10月25.2%的最高涨幅，降到1996年的6.1%。四是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速度。1993年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只有一两个百分点。这次宏观调控，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较快速度，实现了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也为后来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础。

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过程中，“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八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1995年达到61130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2.2%，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1倍以上。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70%，投资结构有所改善。199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736亿美元。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扣除物价因素，“八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八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比较突出的是前期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五年商品零售价格年均上涨11.4%；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悬殊；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腐败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

党中央认真总结经验，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着手研究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九五”时期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作出新部署，即：到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强调，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

全面进步。9月28日，江泽民在全会闭幕时发表讲话，深刻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12个重大关系[①]。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长期稳定。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这个纲要。

二、党的十五大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的噩耗传遍全国和世界。全国各族人民陷于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面临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历史抉择。

党的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

① 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五大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



★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大会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归纳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大会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

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问题作出新的阐述。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大会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些论述，体现了党在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大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对如何实现第三步目标作出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新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围绕着这个发展战略，对我国的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

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此，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全面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按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15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日，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并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十五大通过的

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前进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深刻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



★ 1998年7月，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召开。

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加快，我国农业管理体制和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致使1996年农业生产在取得丰收之后又出现了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局面。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坚持把农

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

为解决农产品相对过剩问题，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各地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为此，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积极发展畜牧水产业，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城乡市场。通过这些调整，种植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畜牧业发展步伐加快，促进了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增值，农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农业和农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决定》强调，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全会还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中央的这一决策，让亿万农民安了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党和政府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1994年初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施这个计划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逐年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由1994年的97.8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15亿元，累计投入中央扶贫资金1127亿元，相当于上一个7年扶贫投入总量的3倍。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按1978年贫困标准）减少到320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5%左右。这7年间，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累计修建基本农田6012万亩，新



★ 1994年2月28日至3月3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在会上讲话。

增公路32万公里，架设输变电线路36万公里，解决了5986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和67.7%。到2000年，我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1994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局面仍在延续，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发展，到1996年上半年甚至出现净亏损的局面。这既有经营管理不善、债务沉重、设备工艺老化、产品缺乏竞争力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社会包袱沉重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以上海宝钢和辽宁鞍钢为例，前者年产钢700万吨，仅有2万多职工；后者年产钢800多万吨，却有职工22万多人、12万退休职工，另外还有18万职工子弟等待安排就业。这种情况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必须寻求新思路，才能取得新突破。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

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城镇住房公积金等，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五大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锐减，加上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国内产能过剩，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供大于求。这种状况使历史包袱沉重而且经营机制转换又没有到位的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大批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上千万职工下岗。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国务院在1997年确定把"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城市由58个扩大到111个，参加试点的大型企业集团由57家扩大到120家。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政企分开迈出重大步伐，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等一批特大型企业集团。这些大型国企按照市场要求运作，不再承担行政性职能，由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增强了自我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并在境内或境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不仅募集了大量资金，改善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而且在促进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形成、扩大国家财政收入渠道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有小企业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了改革步伐。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党中央认真总结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积累的初步经验，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民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

有企业；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

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国有企业展开了多层面、深层次的改革攻坚。国有企业中亏损最大的纺织行业，通过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分流下岗职工60余万人等措施，率先实现整体扭亏，成为国有企业中整个行业摆脱困境的突破口。国家重点监测的14个行业有12个整体扭亏和持续增盈。煤炭、军工两个行业的亏损额大幅减少。以东北老工业基地脱困为重点，带动了全国扭亏增盈，31个省区市有30个扭亏和持续增盈。小企业结束了连续6年净亏损的局面。这些成效说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3年目标基本实现。这是党中央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抓住时机、正确决策的结果，同时也要归功于工人阶级与党同心同德、为改革事业作出的巨大奉献。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大量职工下岗问题。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300万人，此后逐年上升，到1997年突破1000万人。这是改革和经济结构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主要原因是，长期存在的



★ 1998年5月14日，江泽民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

重复建设难以制止，企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力差，加之技术进步加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需要的工人数量也随之减少。大批职工下岗，生活十分困难，成为万众瞩目的社会问题。

面对短时间内出现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再就业培训力度，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解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把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作为首要任务，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各级政府按照中央部署，先后为下岗职工建立起三条保障线：一是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二是三年后未就业者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三是失业保险满两年仍未就业者可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许多地方还通过加强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引导职工转变择业观念，大力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同时，启动了以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些措施保障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和风险。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党在十分复杂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进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等战略措施。1994年，针对经济特区建设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1]，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央

[1] 指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在经济特区的一些干部群众中出现了特区已经不“特”，特区还要不要“特”、还要不要继续发展的议论。

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①]。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②]。

根据这些重要决策，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大力推进对外开放。这一时期，我国先后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同时明确了以浦东开发区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要在21世纪初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1992年，我国对外开放又迈出新步伐：一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二是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境、沿海省会城市；三是开放珲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四是开放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到1997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达到235个，二类口岸达到350个，逐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2000年以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全国广大腹地扩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更趋完善。同时，利用外资的领域逐步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国家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

① 江泽民：《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1994年6月20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目，不分地区都可以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①]，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于1986年7月作出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决定，并随即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对外谈判工作，开始长达15年的艰难谈判。1993年11月，江泽民在西雅图同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会晤时，阐明了中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②]。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了这些指导原则。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谈判中提出的高要价，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党中央又相继



★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议定书上签字后与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鼓掌祝贺。

① 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有“经济联合国”之称。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一年后取代关贸总协定。

②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页注[13]。

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①。经过反复较量和艰苦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名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参与制定规则和竞争的有利位置，从而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产生深刻影响，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党中央根据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潮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时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对外开放“走出去”等多项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是在科学技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2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

① 江泽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2002年2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

学技术发展纲领》，对面向新世纪的科技发展作出规划。为落实《纲领》的各项要求，国家科委和有关部门联合推出一系列科技和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并先后在沈阳、南京等八个城市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93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我国的科技力量和社会各界，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生产力。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1994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强调科技体制改革要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即稳定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事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研究；放开各类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发和研究，放开放活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使之与市场规律相适应。

1995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这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5月26日至3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作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强调：当代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 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

技术更替不断加速。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在继续实施“863”计划的同时，1997年6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加强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工作。随后由科技部组织实施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实施这个计划的战略目标是：加强原始性创新，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领域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从1998年起，国家逐年加大了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中央财政5年内投入25亿元用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国务院先后对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应用型科研机构实行了企业化转制。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开展了共建实验室、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兼职、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机构进入企业加强面向市场的产品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这些举措有力地

推动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为鼓励广大科技人员建功立业，建立健全了表彰激励机制。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从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2001年2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颁布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项目和人选，数学大师吴文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荣膺该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颁发一次。2001年度至2012年度共有20人获奖[①]。



★ 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部分科技专家。

① 分别是：王选、黄昆（2001年）；金怡濂（2002年）；刘东生、王永志（2003年）；叶笃正、吴孟超（2005年）；李振声（2006年）；闵恩泽、吴征镒（2007年）；王忠诚、徐光宪（2008年）；谷超豪、孙家栋（2009年）；师昌绪、王振义（2010年）；谢家麟、吴良镛（2011年）；郑哲敏、王小谟（2012年）。

在教育方面，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①]。1995年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法律上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实施了加强重点高校建设的“211工程”，旨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促使高校布局和结构趋于合理，提高办学规模效益和教育质量。教育部采取“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多种方式，合理调整高校布局结构，原国务院部委管理的360多所高校多数改由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一些需要国家管理的学校由行业主管部门划归教育部管理，逐步改变了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状况，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形成了政府为主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办学新体制。“九五”期间，国家大幅度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有力地支持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使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在迈向新世纪的道路上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

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既要依靠科技进步，更要充分考虑

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5页。

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多种因素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在我国经济高速粗放增长、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形势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需要，不以牺牲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转发《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明确提出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我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时，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同时又强调了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今后15年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实施这两大战略作了具体规划。党的十五大和翌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将实施这两大战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指出迎接新世纪科技革命的挑战，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重要的战略位置，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搞好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大力推进“一控双达标”（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工作，全面开展“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的污染防治（简称“33211”工

程）。十五大以后，国务院先后颁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相继作出严厉打击非法捕杀和经营野生动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等一系列规定，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逐年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特别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速生丰产林建设等工程的实施或启动，在我国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和国家继续严格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着力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和优生优育的宣传，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成绩。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200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约为12.67亿，实现了到2000年将全国人口规模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

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①]，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差异很大，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发展速度不同，地区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比较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对外开放早，具有率先发展的有利条件。

1988年9月，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

① 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国务院批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政策。

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转变的时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突出地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要求在“九五”期间以及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在“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梯次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得巨大成绩。1998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48114.90亿元，占全国的58.12%，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水平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更为突出，同年西部10个省区市国内生产总值为1.155万亿元，只占全国的14.7%。西部与东部的地区差距出现的扩大趋势，不仅有悖于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会影响东部地区的继续发展。

西部开发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1997年8月，江泽民在一份《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批示：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

① 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以实现的。根据这一批示，国务院采取了在西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和移民开发等一系列措施。广大西部地区的人民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规模植树造林，向荒漠化开战。西部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世纪之交，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00年1月16日，国务院成立由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任正、副组长的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该小组在有关部门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设想。同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会后，国务院就西部大开发中的资金投入、投资环境、对外对内开放、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等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措施，明确规定当前和今后一个



★ 2000年2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的社火大赛上，公路运管职工的社火队竖起了“开发大西北”的标语。

时期的重点任务和目标是：力争用五到十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开局；到21世纪中叶，要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西部大开发战略由此全面启动。到2000年，西部地区十大重点工程全部开工。2001年，又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对外开放"走出去"战略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根据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党中央在世纪之交提出并实施了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推动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新格局。

1996年7月，江泽民在河北省唐山市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①]。党的十五大闭幕后不久，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1998年2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阐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方针时强调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②]。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② 江泽民：《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998年2月26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不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①]。

根据这一部署，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的侧重引进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持续稳定增长，2001年新签订涉及电力、交通、建筑、石化等行业的大型工程项目15个。到2001年底，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合作项目195个，总投资46亿美元；累计设立各种境外企业6610家，其中中方投资84亿美元；境外项目平均投资达252万美元，比上年提高近30%。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在实施海外投资战略中发挥了龙头作用，已初具跨国公司雏形。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更加清晰。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党中央在跨世纪发展道路上作出的又一项富有远见的决策。

四、政治文明、先进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505页。

神文明，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世纪之交，伴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扎实推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四大以后，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对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采取中央、省、地（市）、县、乡五级联动方式，在三年内基本完成。中央一级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精减机关人员；省、地（市）两级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社会保障职能；县级政府按照“小机构、大服务”的方向，把大部分专业经济部门改为经济实体或服务实体；乡一级机构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前提下减少脱产人员。在理顺关系的基础上，各级机构精减人员25%左右。与此同时，加快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1993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于10月1日起施行。

党的十五大以后，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加快。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主要围绕精简机构和人员、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宏观经济调控

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明确各政府部门职责等方面展开。按照国务院关于“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由各部委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共有200多项；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100多项；各部门内设司局级机构比原来减少200多个；机关干部编制总数减少了一半；国务院部委由40个精简为29个。机构改革完成后，又围绕转变政府职能，采取了一系列深化行政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把一批重点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所办经营型企业全部移交给地方；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企业脱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管理人员不再享有国家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待遇；加强政府综合管理和服务企业的功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着力解决审批项目和环节繁多、随意性大、职能扭曲等弊端。同时，对招投标制度进行规范，实行公平、公开、公正的招投标办法，使有形建筑市场与政府管理部门脱钩，政府采购部门与集中采购机构分离，形成制约机制。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与经济体制转轨相适应，国家的法制建设也进入快车道。自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修正案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当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公司这个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快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行政行为程序的法律，对于治理当时存在的各种行政处罚乱象、确保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与此同时，旨在规范行政审批制度的行政许可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也开始启动。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制定了一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使资本市

场的健康发展有了法律保障。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80年代出台的经济合同法（1981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5年）、技术合同法（1987年）进行整合规范，该法共有428条，是3个旧合同法条文总数的3倍。从此，我国的市场交易规则更加完备，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保障人权方面的立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制定实施了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体现了党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还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使我国立法工作进入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为规范的新阶段。2001年，国务院发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进一步推动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进程。为适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还及时修改了一批法律和法规，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多个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以及海关法、保险法等，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法律环境。

基层群众自治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即有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在新形势下更加活跃和发展起来。

在广大农村，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由点到面、逐步推开，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村民自治制度逐步完善。这项制度对于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习惯起到了重要作用。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此，村民自治驶上快车道。

在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直选和社区居民自治制度逐步推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和人们自由择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身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居委会除发挥原有的民事调解、治安保

卫、公共卫生、民政福利等作用外，在协助解决居民就业、落实社会保障、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等方面也开始发挥作用。1999年，民政部在全国26个城市（区）进行社区建设试点，主要内容是实行民主选举，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居委会建设。2003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个街道办事处级别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鲁谷社区代表会议宣告成立。《鲁谷社区代表会议章程》规定：社区代表会议代表社区广大居民和社会单位的共同利益，履行协商议事、民主决策、协调监督的职责，承接政府逐步剥离出的有关社会事务，参与社区建设，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依法自治。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监督企业干部的基本形式，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57年，就在企业中正式建立起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到80年代以专门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一制度。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主人翁地位，调动职工积极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非公有制企业也逐步建立起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为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上，我们党确立了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个基本原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并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民族、宗教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和国内改革不断深化背景下民族、宗教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全面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强调各族人民要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90年代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送符合条件的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同时加强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使之成为民族地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和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199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援力度。从1994年至2001年，国家先后投入48.6亿元援建了62项工程，极大地改善了西藏交通、能源、通讯和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局面。1996年，党中央又作出决定，组织沿海发达省、直辖市对口帮助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贫困地区，促进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取得很好成效。

1999年9月29日，党中央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各民族地区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族团结日益巩固。

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宗教工作方面，党中央妥善处理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出现的日益复杂的宗教问题，保持了宗教界的稳定。1990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作出

部署。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1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工作。会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对宗教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党中央始终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对宗教界爱国人士，提出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了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进行政治渗透和分裂中国的活动。1995年，围绕班禅转世灵童问题同达赖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99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了维护新疆稳定的问题，明确指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为此，党中央提出并坚持积极做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与他们达成共同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的共识，为维护新疆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定走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正确处理与梵蒂冈的关系，做好新形势下的天主教工作。

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稳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取得新的重大进展。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得到普遍重视，

推动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央宣传部从1991年开始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1]奖评选活动，评选各省区市、中央部分部委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组织生产、推荐申报的精品佳作，鼓励文化艺术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进一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导向作用。

根据十四大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1994年8月23日，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级有关部门把爱国主义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8月31日，中央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教育战线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大力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 青少年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对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

① “五个一”是指：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片）、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文章。1995年度起，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也被列入评选范围。

人主义滋长；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为加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部署。《决议》规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从组织上保证决议精神的贯彻落实，1997年4月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建立了相应机构。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2010年远景目标时，都把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列为重要内容。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后，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活动在全国各地进一步蓬勃开展。1997年3月，中央宣传部在已经确定300个文明行业示范点的基础上，又确定100个创建文明城市示范点和200个创建文明村镇示范点，使这项活动形成了各方面齐抓共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在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社会各界广泛开展，包括推广文明服务用语，制定市民、村民公约，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实行社会服务承诺制，文明上岗优质服务等。一些窗口行业还开展了“为人民服务，树行业新风”等活



★ 创建文明城市的先进典型江苏省张家港市。

动，收到良好效果。1993年底，团中央发起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组织各级团组织建立青年志愿服务队，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推动青年志愿者行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的“希望工程”[①]，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组织实施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春蕾计划”[②]，中国社会服务促进会发起的旨在提高孤儿素质、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救孤计划”[③]等活动，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了扶危济困的美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1996年12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科

① “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

② “春蕾计划”是一项旨在帮助因生活贫困而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女童重返校园接受学校教育的爱心工程。1989年，在全国妇联领导下，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为了加强女童素质教育，培养女童自力更生建设家乡的本领，中国儿基会还设立了“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

③ “救孤计划”是在民政部指导下，中国社会服务促进会于1993年10月推出的。它主要面向社会募集款物，对孤儿进行助养助学，改造福利院危旧房屋，添置医疗设备，致力于提高孤儿素质。

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从今冬明春开始正式实施。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缺医少药，信息闭塞，科技落后，文化生活贫乏。文化、科技、卫生下乡，是农村所缺、农民所盼。“三下乡”活动如雪中送炭，使广大农村群众获得了致富信息和技术，获得了健康知识和医疗服务，获得了精神文化的享受。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通过道德建设，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区各部门加强领导、重在建设，各行各业注意以人为本、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注重道德培养，全社会逐渐形成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



★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城北分校组织少先队员观看雷锋事迹展览。

氛围和良好风尚。

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题，并把它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①]

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实施"精品战略"为核心，通过加强管理和深化改革，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国家陆续制定和完善出版、印刷、音像制品、营业性演出以及广播电视等方面的管理条例，为文化精品进入市场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扶持，使健康的文化产品占据文化市场的主导地位。到2000年底，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2.5%和93.7%，比1995年分别提高13.7%和9.2%。反映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健康文明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更加巩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党和政府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的改革创新，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完善文化工作管理体系、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政策法规体系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2000年底，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响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等门类的产业单位有22.3万个，从业人员达91.9万人，创增加值118.9亿元。党和政府还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文化项目建设。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九五”计划完成和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

在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按照党的十五大的战略部署，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确应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胜利。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原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金融危机冲击，党中央在1998年2月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措施很快见效。1997年以后，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2000



★ 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场。

年，国民经济稳步回升。在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危急情况下，中国兑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充分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通过克服金融危机，党和政府增强了应对挑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1998年夏，我国遭遇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3亿。面对特大灾害的考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确决断、周密部署。广大军民不畏凶险、奋力抗灾。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一线，各级领导干部也纷纷奔赴现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30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1999年，党中央领导人民及时果断地进行了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重大政治斗争。针对极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及时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邪教歪理邪说，对被“法轮功”邪教组织裹胁蒙蔽的人员



★ 1998年8月13日，江泽民在湖北省洪湖市乌林镇慰问抗洪一线军民。

进行教育转化，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奋斗目标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

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到2000年，“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完成或超额完成。“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达9977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1997年提前3年完成。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达1339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5%。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9%和67%。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898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79.9%。国家外汇储备2000年底达到1656亿美元，比1995年底增加920亿美元。到2000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分别达到2253元和6280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7%和5.7%。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九五”计划的完成，使我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实施“十五”计划、开始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到2000年，我国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国有大中型

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在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迅速形成。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迅速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步伐加快，城镇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机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与此同时，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关系，建立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1993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粮食定购实行"保量放价"的决定，即保留定购数量，收购价格随行就市，这意味着实行了多年的粮食价格"双轨制"终于结束。同时，钢铁、煤炭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也相继并轨。到1996年，价格"双轨制"基本结束。到2000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95.8%、92.5%和87.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因素仍很突出；科技、教育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重要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一些领域市场经济秩序相当混乱，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现象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还比较严重。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党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以后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新的蓝图。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从新世纪开始，

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要全面估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充分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议》提出“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纲要。

五、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与对外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

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恢复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作战图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指挥控制系统和侦察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抓住“打得赢”“不变质”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继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①]。这个总要求，对全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通盘筹划和推进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研讨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通盘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

① 江泽民：《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1990年12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 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会议在军事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

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四个教育”[①]、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军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初步理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1998年7月，党中央果断作出军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消除了很多隐患，对于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促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重点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

全军积极探索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

① “四个教育”，即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

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这是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装备部。全军装备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国防科技方面，坚持科研先行，积极开发国防关键技术，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



★ 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三代战机——歼10战斗机编队飞向蓝天执行训练任务。

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军事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军队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使全军各级指挥员的专业文化素质大为提高。军队后勤保障体制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兵役制度和士官制度进行了改革。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两个结合”兵役制度，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与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参与大量扶贫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筑路修桥和抗洪抢险第一线，都有官兵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身影。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的扩大

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后，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前期合作基本顺利。1989年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双方在香港后过渡时期要加强磋商与合作的精神，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

1991年12月，英方突然宣布更换香港总督。新任总督彭定康上任不久，便公然在其施政报告中抛出要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改变的“宪制改革”方案，即所谓的“政改方案”。这一方案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有关规定，其实质是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阻挠和对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中国政府反复努力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党中央从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出发，于1992年底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紧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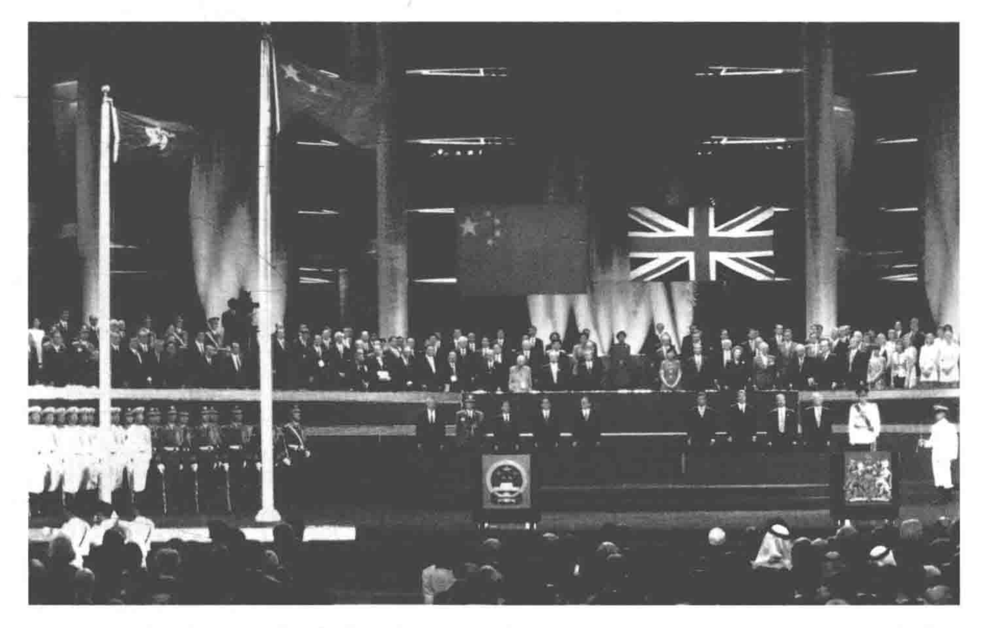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成员由内地和香港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其中香港委员不少于50%①。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月，预委会在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广泛征求港人和内地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就未来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和民生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46份比较系统的书面建议和意见，有些还形成了正式文件，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预委会的有效运转，给港英当局以有力的回击，迫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抗政策。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几年，中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也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筹委会成立后，立即开始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组建问题，在香港展开大规模的咨询活动。11月初，筹委会在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基础上，推选出400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揭开了全面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序幕。12月11日，全体推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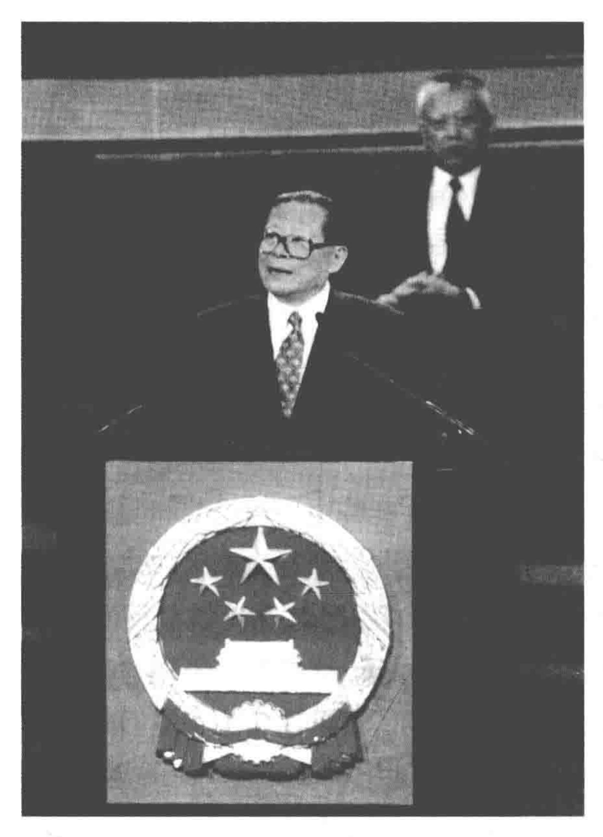
① 《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人民日报》1993年7月3日第1版。

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21日，推委会在深圳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60名议员。从此，香港进入一个港人自己拥有立法权的新时代，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



★ 1997年7月1日零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同时升起。



★ 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在香港交接仪式上讲话，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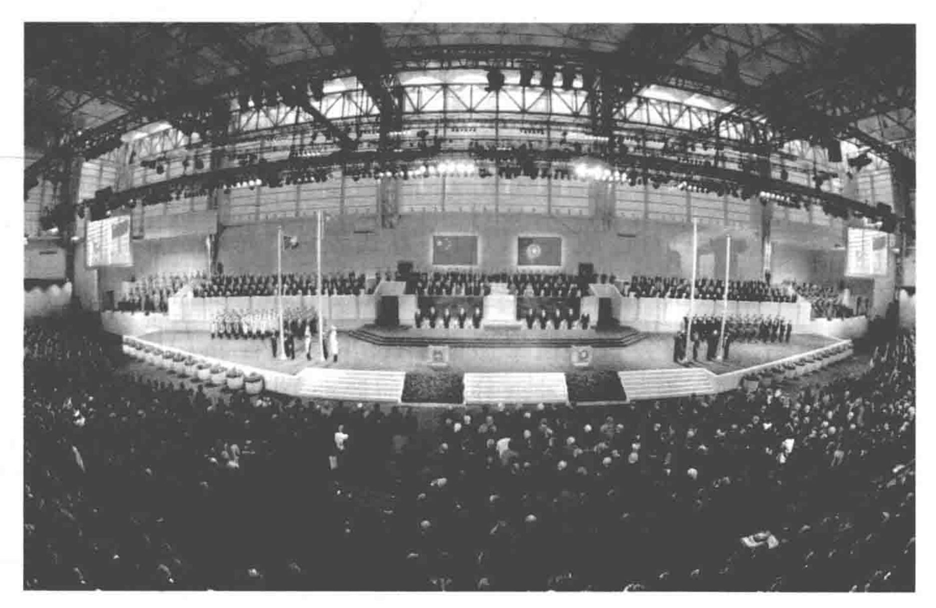
个崭新的时代。”[①]交接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在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澳门回归问题也提上日程。由于中葡双方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也进行得平稳顺利。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从9月起，筹委会就澳门特别

① 江泽民：《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的讲话》（1997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1页。

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澳门开展了广泛的咨询活动，在充分吸纳澳门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1999年4月10日，筹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5月15日，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0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一年多紧张、高效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举世关注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



★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代。”[①]澳门的胜利回归，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成功的。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继续在香港、澳门地区履行职责。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党中央稳步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自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展开。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重申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两岸双向、直接“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1991年底，祖国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台湾海基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于11月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汪辜会谈”[②]，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四项协议，由此突破了以往台湾当局规定的同大陆“不接触、不

---

① 江泽民：《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的讲话》（1999年12月20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页。

②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



★ 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会谈开始时握手。

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1993年8月到1995年1月，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先后举行三次副会长、副董事长级的会谈及六次副秘书长级的工作商谈，以解决两岸交往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推进协商进程。1994年3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同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对台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对台经济工作，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台商在祖国大陆的合法权益，改善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为台商投资创造更为有利和方便的条件。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党中央科学分析台湾局势和两岸交流发展趋势，深入思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



★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

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个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2100万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公布后，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逐步巩固其地位，开始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分裂步骤，破坏两岸关系发展。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声称要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推到高潮。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又

抛出所谓“两国论”，声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赢得选举后作出“四不一没有”[①]的承诺，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久又否认存在“九二共识”。2002年8月，陈水扁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营造了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推进两岸交流的宏观环境。

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党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应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

① “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布“台独”、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问题。

利钦访华，两国宣布互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提出建立中俄新型关系的六点原则主张。1996年4月，中俄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都应尊重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促进了两国间遗留问题的解决。经过谈判，双方继1991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之后，又于1994年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解决了两国间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

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上稳定并有发展。继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确定了框架和发展方向，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①]主张。然而，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



★ 首都高校学生集会强烈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

① “三不”，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事件。对此，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91年，中国同西欧的关系恢复正常。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①。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宣布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随后，欧盟决定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中日两国保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愿意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此后一段时间内，尽管日本在对待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仍不时有反复，但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保持继续发展，高层互访也很频繁。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发展新世纪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新的进展。

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001年，为促进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中国首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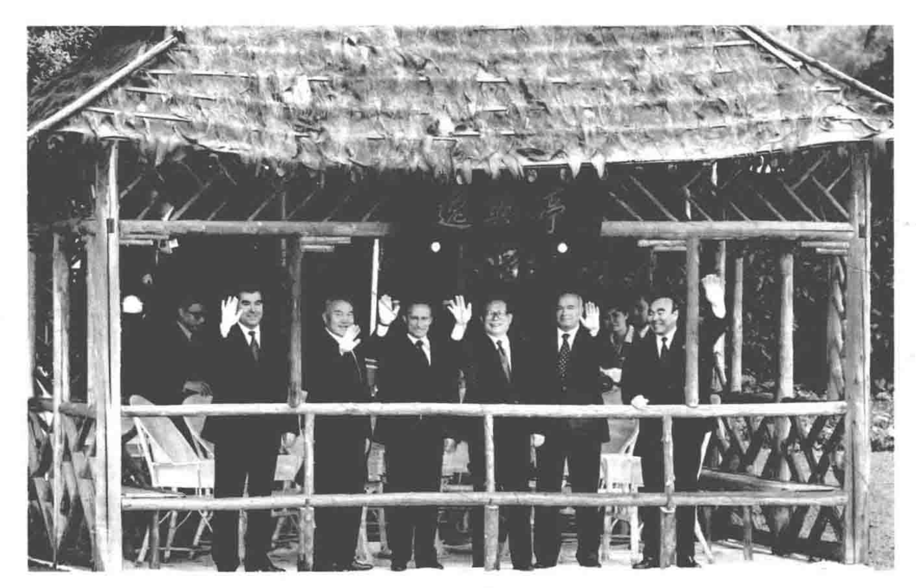
---

① 分别是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1996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江泽民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访印期间，中印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访巴期间，中巴宣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巴期间，江泽民还提出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92年初，中国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中亚五国[①]建交。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形成。1997年，中、哈、吉、俄、塔五国元首在莫



★ 2001年6月14日，江泽民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晤前在上海西郊宾馆逸兴亭合影。

① 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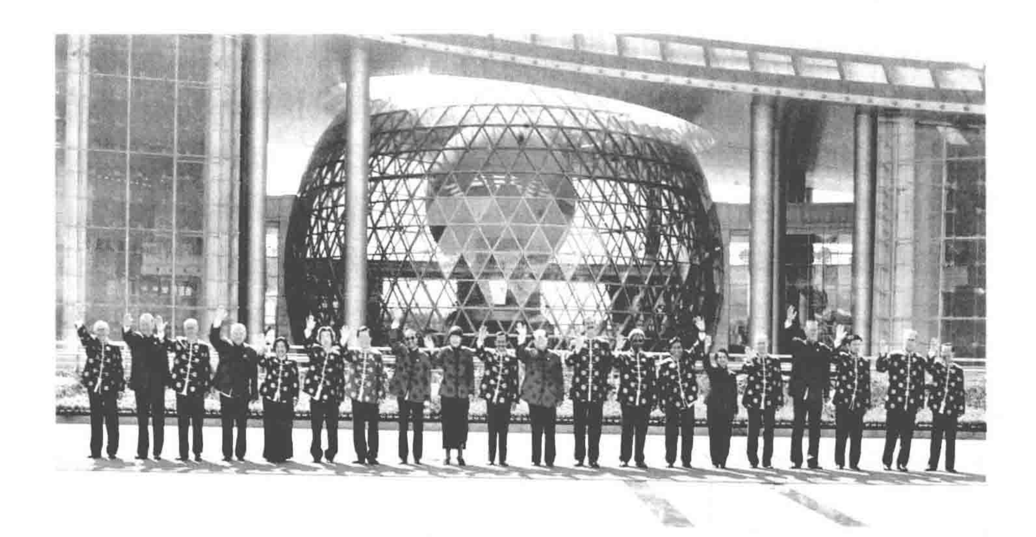
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达成广泛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提供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中国始终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一贯主张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关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磋商和对话，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高层往来频繁，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保持了传统友谊。1996年5月，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5点建议①。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宣布，在未来2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快速深入发展，南美地区除巴拉圭外所有国家均同我国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原则，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7日，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

① 即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



★ 2001年10月21日，江泽民和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成员国领导人在上海科技馆前合影。

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

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坚定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原则下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对话与合作。2001年10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江泽民主持下，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六、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途径，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成功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21世纪。

明确党的建设总目标和两大历史性课题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科学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

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有关部门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他指出，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定要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他强调，这“应该作为我们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前进目标”[①]。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与此相适应，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也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十四大报告指出，党所处的环境和所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②]。根据这一

① 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页。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总体要求，大会对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部署，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即：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决定》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①]。围绕这个总目标和总任务，全会要求在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要针对不少地方党组织涣散问题，着重解决好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二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是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党的组织就会更加坚强、更加巩固，就能够从组织上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使中国更好地迈入二十一世纪。”[②]

党的十五大对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作出新概括，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会要求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② 江泽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994年9月28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全党“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①。

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是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任务。党的十五大着重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带有根本性的历史思考。根据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江泽民又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党的建设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加以思考，于2000年1月14日在十五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完整地提出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使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朝气蓬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胜利前进。

党的建设总目标和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适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扎实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和开展“三讲”教育活动

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党紧密结合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按照党的建设总目标和总要求，紧紧围绕两大历史性课题，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按照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要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党中央及时作出决定，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并强调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民族振兴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 群众在新华书店争相购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一、第二卷增订再版。1995年，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出版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按照中央部署，由高中级干部带头，广大党员干部参加的学习热潮迅速兴起。党的十五大后，中央委员分批到中央党校学习邓小平理论。1998年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进一步动员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按照中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围绕全面、正确、积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开展理论教育，采取党校培训、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讲师团辅导、举办理论研讨班等有效形式，组织干部广泛深入学习理论。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至1996年底，全国参加各种形式脱产学习的干部约2100万人次，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干部约39万人次，省部级干部约1200人次。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不断加大理论宣传力度；教育系统开始把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上日程；群众性的学习活动也在企业、农村、社区、军营、机关和校园开展起来。各级党委狠抓制度建设，不断创新方法，把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脱产进修制度、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在职干部自学制度、考核制度方面的有关内容以文件方式固定下来，有力推动

了理论学习的深入开展。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得到加强。2000年6月，中央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江泽民发表讲话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他在讲话中提出并阐述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当时直接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问题，强调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

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规定从党内选举到对领导干部进行评议、监督，都要充分发扬民主。同时着眼于党的工作大局，重申党的组织原则，强调坚持“四个服从”[①]，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制度；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及人民团体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原则的确立，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在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党中央相继印发《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社

① “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会团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等文件，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各个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坚持分类指导，以农村、企业、街道社区党的建设为重点，同时不放松高等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不断拓展新领域、扩大覆盖面，整体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农村，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根据农民提出的“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各地共派出300多万名机关干部驻乡进村，围绕建设“五个好”[①]的目标要求，连续六年分期分批对后进村党组织进行整顿，着力解决村级组织“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的问题，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在此基础上，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开展以创建“五个好”村党支部、“六个好”[②]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为内容的“三级联创”活动；以构建健康、和谐的农村“两委”关系为目标，积极探索农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途径和办法，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同时，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分批轮训，提高了整体素质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

---

① “五个好”，即建设一个好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书记，能够团结带领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锻炼一支好队伍，共产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干部能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共青团员能够发挥助手和后备军作用；选准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完善一个好的经营体制，把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引导和帮助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体现民主管理原则，保证工作有效运转，使村级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② “六个好”，即选配一个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正廉洁、团结合作、战斗力强的好班子，首先要有一个党性强、作风正、能力强的乡镇党委书记；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素质优良、群众拥护的好的乡镇干部队伍；选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好路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管理和监督的好制度；保持一种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形成一个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好的工作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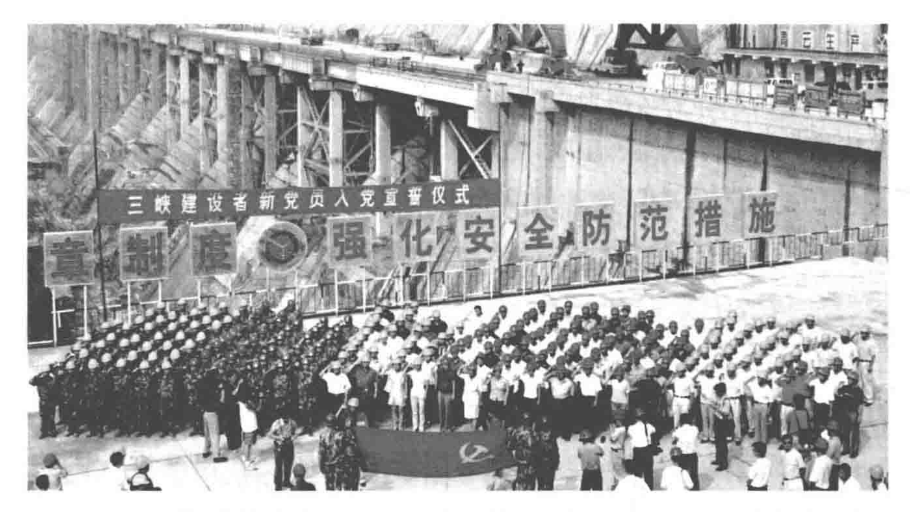
在国有企业，与推进改革攻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方针原则和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实行党委班子成员与经营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得到有效保证。紧紧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和生产经营管理，努力探索开展党建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有效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发挥了较好的服务和监督保证作用。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企业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城市街道社区，适应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社区建设的需要，注重抓好社区党组织的组建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围绕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服务、提高市民素质等开展党建工作，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一些地方积极探索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了条块结合、优势互补，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社区内各单位基层党组织共同参加的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格局。

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各地积极探索党的工作进入这些新领域的方式方法，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和区域统筹等方式，加快在“两新”组织中组建党组织的步伐，使党的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增强。

在高等学校，坚决抵制党的作用淡化等错误主张，进一步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

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党的十四大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出新要求，强调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素质，增强党性，使党员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献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带领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实绩的先进分子。在全党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尊重科学、真抓实干的精神，



★ 2001年6月，奋战在建设一线的258名新党员在工地上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谦虚谨慎、崇尚先进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①]。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已有五千四百多万党员，教育和管理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大批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管理好流动中的党员；消极腐败现象侵蚀着党组织的肌体，需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坚持党的宗旨，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②]面向新世纪，党的十五大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

---

①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2页。

创造一流的成绩；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

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强调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讲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严守党的纪律。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对全国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在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中，50年代末6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占主体；新的省部级政府班子成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6%。县（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年富力强，知识面较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做出了实绩。1996年，党中央制定《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广大党员干部按照中央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钻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知识，能力素质都有所提高。

与此同时，中央还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在对干部的选拔、考核、任用、交流、监督等制度改革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选拔任用干部方面，按照“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1995年2月，党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扩大民主、强化监督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提供了基本规章。在此基础上，各级领导层的新老合作与交替加快了步伐，一大批中青年干部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仅地（市、区）级党政领导班子中，40岁以下的干部就达到1300人；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分别达到93.5%、91.57%和83.6%，党的中、高级干部平均年龄普遍实现了年轻化，文化程度及整体素质明显提高。200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对党政干部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等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分级分批进行。党中央对“三讲”教育高度重视，作出全面部署，进行精心指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分赴7个县（市）进行调研，指导工作。从1998年11月到2000年底，共有70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三讲”教育活动，其中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达2100多人。党内外干部群众对“三讲”教育十分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仅直接听动员报告、参加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就有500万人以上。通过“三讲”教育，广大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锻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自觉性得到提高。

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列，涌现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一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共产党员。据统计，1997年至2001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2946人中，有共产党员2594人，占88.05%；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5068人中，有共产党员4350人，占85.83%。这些先进模范人物奋战在各条战线，充分展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风采，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先锋。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甚至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1993年，党中央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以后每年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专门研究，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向全党作出部署，并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党内已形成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不断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路数”[①]。

1993年8月，十四届中央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江泽民在会上提出，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做好反腐败工作：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二是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重点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三是紧紧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刹住群众最不满意的几股不正之风。根据江泽民讲话精神，会议提出反腐败斗争的新思路和新办法，这就是：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和行政、经济决策的实施来进行反腐败工作；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坚决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包括纠正不正之风；加强法规和政策研究，及时规范行为；加强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在反腐败斗争中，对广大党员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会后，党中央、国务院着重抓了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狠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三个方面的工作，逐步形成了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提出“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力度”。这标志着党的反腐倡廉方针从标本兼治、注重治标开始向标本兼治、注重

---

①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治本转变。

为保证党政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中央先后作出一系列规定。1995年1月，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提出，建立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登记制度、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度。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如何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重要探索。为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1996年1月，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提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负责了解省部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及廉政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并及时报告党中央的具体监督措施。



★ 反贪污贿赂总局大门。

为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健全相关机构，制定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制度，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即国家反贪总局）正式成立。1997年2月，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

行)》。1998年11月，发布《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截至2002年，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党内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执行，为依法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依据。

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66.93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2.15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万多人①。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万多件，结案84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84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3.7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万多人②。特别对一批大案要案查处，产生了大的震慑作用，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在查办案件中，各级党委、纪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通过调查核实，既惩处了一批违纪违法者，又为35.8万多名受到失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了是非。对有一般性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给予批评帮助，促其主动改正。

1998年7月，中央作出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是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大决策，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年底，军队、武警部队和各级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到2000年3月，这项工

①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1997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作基本结束。

为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对加强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①]的要求。各级党委、纪委按照中央要求，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内法规和廉政法律法规，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宣传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成就，利用一些重大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解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践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入思考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000年2月20日，江泽民出席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五个始终”的要求，即“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必须结合新的历史

---

① “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①]。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围绕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两个题目进行调研。考察期间，江泽民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他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活力，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当今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党的全部历史经验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经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党的状况尤其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2000年5月至2001年6月，江泽民分别到北京、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海南、甘

---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②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肃、宁夏等地考察，并主持召开近30次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先后在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央纪委全会上，从不同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问题作了论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完善。

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制定了《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从2000年冬、2001年春开始，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的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用两年左右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是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一项重大决策。根据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责任制，确定联系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面对面指导工作。这一活动推进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改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取得了"干部受到教育，农民得到实惠"的效果。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各企事业单位和各部门认真学习、积极贯彻、以实际行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全国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可喜变化。

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他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把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①]。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81页。

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完成自己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第十一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本章提要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党的十六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制定

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

党的十六大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66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围绕这一主题，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大向世人昭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50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大会全面回顾了党的十五大以来5年的工作，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总结的10条基本经验[①]，植根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

---

① 10条基本经验是：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3.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5.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6.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7.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8.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9.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10.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智慧结晶。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10条基本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

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根本要求。

大会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报告强调，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发展目标，我国要在本世

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大会还对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对外工作等作出战略部署，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大会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报告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



★ 胡锦涛当选为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胡锦涛、江泽民亲切握手。

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大会着眼于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选举产生由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

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贡献。

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十六大报告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

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为了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贯彻。

2003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研讨班。200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作出部署。6月1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当月，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2003年7月1日至3日，经中央批准，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胡锦涛在7月1日的开幕会上讲话强调，要通过兴起学习贯彻新高潮，切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在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上取得新的成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心同德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为推动领导干部的学习贯彻，9月至12月，中央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连续举办10期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对1500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中央还组织宣讲团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不断深入。

党的十六大后中央组织开展的一系列学习贯彻活动，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中，全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

二、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加坚定地推动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闭幕后不久，2002年12月5日至6日，胡锦涛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深情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指出，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四点希望：第一，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第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第三，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第四，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讲话首次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重要论断。胡锦涛的讲话在全党产生重大影响，为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经受住新考验新挑战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国际范围内，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国际形势又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仍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据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业已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变革和变化，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新问题。我国发展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需要进行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疫病灾害暴发了。

2003年2月中下旬，“非典”疫情在广东局部地区流行，后于3月上旬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至4月中下旬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呈暴发状态。除我国内地外，全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发生疫情。“非典”疫情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面对考验，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作出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的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 2003年5月12日，正在四川考察农村防治"非典"工作的胡锦涛来到自贡市富顺县人民医院，看望医护人员。

共克时艰。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各条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坚守岗位、辛勤工作，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有效控制住了"非典"疫情。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至此，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非典"的发生和蔓延，是一场突发性的灾害，但由此引起党和政府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思考，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区域发展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党中央正确判断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3年4月，胡锦涛对广东考察时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同年8月底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提

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①]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从而将新的发展思路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至此，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更好地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2004年2月，党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他还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

① “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指导地位和要求越来越明晰。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过党的十四大以后十多年的奋斗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加以解决。

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决定》还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健全市场体系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决定》是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

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主要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此，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变过去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从机构设置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得到落实。其后，中央、省、市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基本建立，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出资人财务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后，国有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但实力大为增强。在这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改善。2005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之后，有关部门又相继出台40多个配套文件，形成一整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多种所有制经济都实现新的发展。到200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8.3%，集体企业占2.4%，非公企业比重上升到65.6%。

在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推动省以下财政管理的创新。逐步规范和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针对“市管县”体制存在的问题，在全国许多省份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试点，逐步规范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了财政资金运用效率，促进了县乡财政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和依法理财水平。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为各类企业创造了更加公平

① 该文件共36条，简称“非公经济36条”。

竞争的法制环境。对国有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等，主要是加快其股份制的改造。为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展顺利。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保持了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通过改革，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

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主要抓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二是推进要素市场的发展。经过这两方面的工作，我国市场体系朝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方向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为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但改革的持续与深入，越来越多地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需要花更大力气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因而改革难度明显加大。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

从2003年起，在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克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逐渐回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猛的问题。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一些行业投资超高速增长，其中钢铁比2002年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势必助长信贷规模过度扩张，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会占用大量耕地、削弱粮食生产能力，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将更为尖锐，如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局面，最终将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针对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2003年以来，中央提出必须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将土

地等资源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印发《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和《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2004年初，中央明确提出，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当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2004年“两会”后，国家紧紧把住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及时加大调控力度。2004年下半年，中央明确提出宏观调控仍处于关键阶段，强调要注意防止反弹。要既坚决抑制部分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又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农业特别是促进粮食生产，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由于措施及时，从2004年第二季度起经济缓慢降温。尽管经济运行中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大、货币信贷在高位运行、煤电油运紧张、价格总水平继续上涨等问题，但经济运行总体上已趋于稳定。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粮食生产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9%，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

为巩固宏观调控成果，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家多次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或降低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调整关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充分发挥财税、金融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同时，国家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全国粮食生产扭转下滑趋势，实现了连年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党中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新的发展方针。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求。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方针。又好又快发展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又要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

质量和效益。指导经济发展的方针，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虽只是“好”与“快”顺序的调整，却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和大力加强宏观调控，防止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得到缓解，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较快、结构趋优、效益提高的良好态势。2003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五年达到或超过10%，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显著增强。按世界银行主要汇率因素排名，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益大幅提升。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10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6.2%，企业发展后劲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巩固和提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

党中央继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之后，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

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是一个长期的永无止境的目标。党中央将它作为重大战略目标加以推进，是在我国对内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对外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背景下，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出现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

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和市场竞争而产生的社会分化，不同阶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六大在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十六大以后，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胡锦涛在2005年2月党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 有“花乡农居”美誉的成都市红砂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目标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对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作出新的决策部署。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世纪之交实施后，按照中央提出的重点先行、



★ 青藏铁路通车当天，在位于青海省境内的沱沱河大桥桥头，当地群众欢迎从格尔木出发的“青1”次列车。

适当超前的方针，经过不懈努力，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其中重点展开了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标志性工程建设。青藏铁路建设尤为引人注目。它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工程建设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多年攻关，相继克服了这三大难题。2006年7月1日，经过工人、技术人员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极其艰苦的施工，青藏铁路终于全线建成通车。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对于青海、西藏两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边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000年11月，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200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工程（新疆轮南至上海）全线建成并正式运营。这些工程的建成，有利于将西部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施西部大开发伊始，国家就十分注意处理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相继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三江源保护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注意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陆续启动“两基”[①]攻坚计划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

① “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2000年11月8日，贵州省乌江洪家渡电站开工典礼现场。

使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各族群众精神风貌昂扬向上，为建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而努力奋斗。

在西部大开发扎实推进过程中，党中央着眼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相继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以解决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战略部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央有关部门、东北三省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东北地区改革发展。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综合作用下，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来被拉开的发展差距逐年缩小，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国有大型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取得重要进展，非公有制经济也取得快速发展。一批外资银行纷纷进驻，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通过实施工业结构调整重大项目，一批重点企业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自主创新和先进制造能力不断增强。辽宁沿海经



★ 武汉市三大增长极之一“中国光谷”。

济带、吉林长吉经济区、黑龙江哈大齐工业走廊等一批产业积聚地加紧规划和建设。辽宁阜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2005年以后，国务院批准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范围扩大到大庆、伊春、辽源、白山和盘锦等市。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码头、输引水工程、水电、核电工程等一批关系到地区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为解决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就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出相应的配套措施，加大了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中部地区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高。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太原城市圈等重点经济区加快发展，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国家继续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



★ 天津市滨海新区。

东新区改革开放示范作用的基础上，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还积极推动长江三角洲、台湾海峡西岸等重点地区的开发开放，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东部地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随着以上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均呈现加速发展态势。2011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1%、21.2%，分别比2002年提高了3.2、3.8个百分点。条件较好地区进一步推进开发开放，新的区域增长极不断涌现。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迈出新步伐，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成都、重庆、武汉、长株潭作为国家新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广西北部湾、关中—天水、成渝三大经济区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中新的活跃力量。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①的方针。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在中央党校等干部院校举办50期培训班，对全国5474名县委书记、县长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2004年起，中央每年印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主题分别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这些“一号文件”的鲜明特点，就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党和政府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此，中国农民告别绵延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一重大决策，让无数农民为之激动

① “多予、少取、放活”是2002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指导思想首次提出的。



★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

万分。2006年9月29日，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拿出自己的钱，铸成一个“告别田赋鼎”，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农民对取消农业税的喜悦心情。据统计，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在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国家以解决制度缺失为重点，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五保供养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伤和医疗等社会保险逐步健全，改变了农村无社保的局面。

国家还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进行了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农村改革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系统阐述了党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明确了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措施。《决定》的颁布实施全面推动了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十五”计划的完成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

世纪之交，世界上有一些人怀疑中国在经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还能否持续快速发展，有的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然而，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擎。

“十五”计划的五年，是在风浪中奋勇前行的不平凡的五年。“十五”期间，我国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后，又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都迈上一个新台阶。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9.3%，年均增长9.8%，由居世界第六位上升为第四位。财政收入增长1.4倍，年均增加3650亿元。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幅增长，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经济社会信息化程度迅速提高。改革开放成果丰硕，农村、国有企业、金融、财税、投资等改革和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两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2740.8亿美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58.3%和29.2%。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均取得新的进展。

“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一些矛盾，政府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使国家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

挑战和风险：如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相当严重，改革攻坚任务繁重；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增加。党中央高度重视存在的挑战和风险，努力通过制定“十一五”规划加以克服和应对。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确定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要遵循的原则，并确定了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建议》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坚持六个方面的原则：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建议》的鲜明特点是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十一五”规划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由于人口总量的增加，这个“人均”指标，比中央以前提出的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要求更高了。《纲要》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纲要》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体制改革、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强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既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又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阶段性特征。“十一五”规划还第一次将延续50多年的“计划”改为“规划”，这一字之差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长期规划的功能定位，反映了我国发展理念、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的重大变革。

三、党的十七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部署

党的十六大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复杂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七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73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大会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改革开放近30年的伟大进程、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大会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报告对改革开放推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



★ 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作了“十个结合”[①]的精辟概括。

大会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概括。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① “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表明，党对旗帜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即从“思想理论”扩展为“道路”“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大会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①]，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更高要求。这就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

① 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大会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明确要求。报告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报告强调，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会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和目标要求，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的新认识，标志着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大会还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7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日，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

---

① 2014年12月，鉴于周永康严重违纪，中共中央经立案审查后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2015年6月，周永康因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概括和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概括，强调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个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

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报告还从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依据；党带领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当代世界发展大势、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创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决定将这一成果写入党章，明确规定：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深化改革开放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党的十七大以后，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开拓

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努力奋斗。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化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且迅速由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由美国扩散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其来势之猛、扩散之快、影响之深，实属罕见。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对外贸易出口困难，有效需求不足矛盾凸显，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和产生的冲击，一再强调树立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危机的预案。2008年7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年初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从9月开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迅速加剧。我国经济第四季度增速急剧下滑，大批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就业压力迅速加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准确判断、果断决策、从容应对，将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11月初，国务院研究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2009年初，中央又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大范围实施汽车、钢铁等十个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



★ 2008年12月12日至14日，胡锦涛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同干部职工亲切交谈。

划，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我国经济止跌回升，全年经济增长9.2%。事实证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方针、政策和举措总体上是有效的。尽管如此，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矛盾有所加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和深化改革。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党中央强调要始终坚持推动发展和深化改革相结合，通过不断推进改革，既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此期间，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经济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实现新突破。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党和国家采取措施持续推动探索走向

深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日渐加大，为缓解和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弊端，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对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出明确部署。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力度不断加大，取得新的进展。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尤为引人瞩目。到2011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子信息制造大国，计算机、移动电话、电视机等电子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宽带通信网络，互联网网民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加快推进。2011年，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从2007年的159家减少到117家，并且有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等支柱行业。2010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可以进入能源、军工、电信、航空运输等传统垄断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得到改善。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以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减轻纳税人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鼓励消费。进行成品油税费改革和资源税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节能减排的调节作用。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2010年7月成功上市。此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至此，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2009年之前，中国跨境贸易不能使用人民币结算，进出口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国务

院决定在上海等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2011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扩大至全国。2009年10月，创业板市场正式推出，促进了资本资源与技术创新的有机融合。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06年底，国务院决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到2011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此项工作启动时的2945个减少到1696个。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还适时推出以全方位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此后至2011年，国务院还批准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深圳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山西省、浙江省义乌市、厦门市进行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些改革试验，旨在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索，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农村改革发展方面，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



★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在安徽凤阳小岗村与村民座谈。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用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央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由2009年的1196元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1.22亿农村低收入人口因此纳入扶贫开发范围。中央密集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种田，不仅不交公粮，还能收到各种各样的种粮补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大事。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增强了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进一步催发了农村大地的勃勃生机。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实现8年连续增长，2011年达到5.7亿吨。到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连续8年较快增长。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继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持续向好的强劲势头，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不断提高。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2002年至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0年间，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1.7%和21.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11.5%和11.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坚持实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世界经济发展以有力推动。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居

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8955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既惠及13亿中国人民，也使世界各国人民获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其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日益得到充分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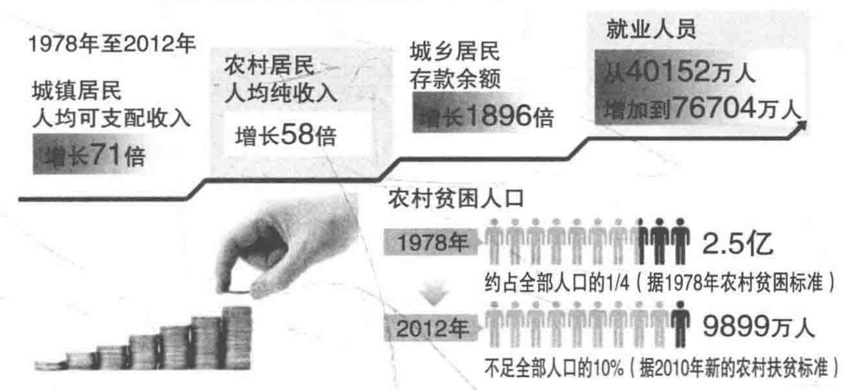
应对各种挑战和“十一五”规划的完成

“十一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国化解了难事、办好了喜事、办成了大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6.9万人遇难，1.8万人失踪，受灾群众达1510万多人。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国迅速组织起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多的抗震救灾活动。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冲锋在前，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社会主义制度珍爱生命、保护人民的本质得到充分彰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得到充分发扬。在夺取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后，党和政府迅速制定灾区灾后恢复重建计划，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并动员全国力量实行对口支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也以各种方式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到2010年9月底，三年重建任务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大大超过灾前水平，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

2008年至2010年间，党和政府还带领人民取得抗击南方雨雪冰冻极端天气（2008年初）、青海玉树强烈地震（2010年4月）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0年8月）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恢复重建的胜利；依法坚决平息和妥善处理了2008年3月14日拉萨等地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和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坚决打

1978—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变化示意图



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按现价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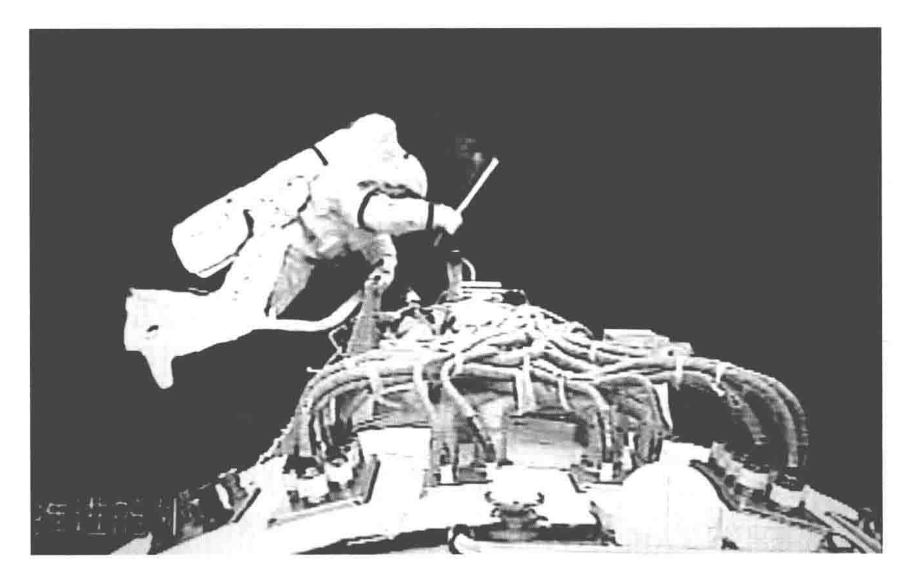
此表出处：《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击了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活动，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成功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表明我国已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体现出党和政府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显示了中国人民在艰难险阻面前坚强不屈、团结互助的伟大力量。

在成功应对各种挑战的同时，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民经济迈上新台阶。“十一五”时期，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3%；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元，经济总量由2005年的世界第五位跃升至第二位，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从2005年的3.16万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42万亿美元增加到2.97万亿美元。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7%和8.9%。

经济快速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同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 2008年9月27日，执行“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出舱活动任务的航天员翟志刚在舱外挥舞中国国旗。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创新战略推动下，重要学科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实现重大突破。继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实现载人航天飞行之后，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飞船航天员成功进行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漫步。“十一五”期间，我国成功发射“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探测器。“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并成功传回第一幅月面图像，宣告我国首次绕月探测成功。在第二次探测中，对探月工程二期月面软着陆地区进行详细观察，为实现探月工程二期“落月巡视勘察”目标打下了基础。三峡水利

枢纽[①]、青藏铁路、南水北调[②]等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国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支持力度。在推进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方面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会议强调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会议还对加快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切实加大了有关政策扶持力度。2010年5月，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入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

① 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从论证、选址、规划、建设到竣工，凝聚了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大量心血智慧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6年5月，三峡工程大坝全线浇筑到设计高程。2008年10月，三峡工程左右岸2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12年7月，地下电站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三峡工程圆满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大坝坝顶高程185米，大坝全长2309.5米，总库容450.5亿立方米，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发挥了十分显著的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

②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战略性工程。按照规划，工程分东、中、西三条线路从长江调水北送，总调水规模448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于2002年12月27日举行开工典礼，分期建设，先期实施东、中线一期工程。东线一期工程干线全长1467公里，于2013年12月建成通水。中线一期工程干线全长1432公里，于2014年12月建成通水。

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在中央正确部署、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经过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推进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全面有序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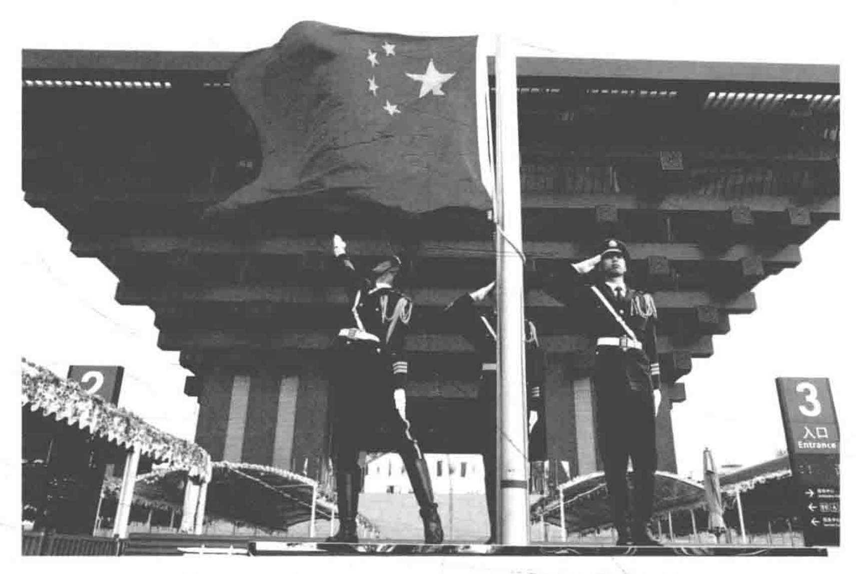
"十一五"期间，我国还办好了许多喜事。2008年8月8日至24日，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口号的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随后，第十三届残疾人奥运会于9月6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



★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场。

会作出决定，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中国北京。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强保障。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居于金牌榜首位，在残奥会上居于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展示了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增进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人类奥运史上从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又一



★ 2010年10月1日，在世博园中国馆前广场举行的中国国家馆日升国旗仪式。

个国际盛会，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在184天的时间里，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308万人次参观展览，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上海世博会书写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书写了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的一页。

经过五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不仅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更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

积极稳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根据形势要求和人民期待，党中央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把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加以推进，取得重要进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2005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意见》和《监督法》对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保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对同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权，对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都作了明确规定。2010年3月，修改后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了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原则，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制度。中国特色社



★ 2011年12月3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圩西村的村民在投票选举区镇两级人大代表。

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党的十六大重申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 2008年3月4日，胡锦涛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这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这个法律体系，立足中国国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意志。它的形成，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有法可依，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了重要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200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和监督作用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06年7月，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

议强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2006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坚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十七大以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有了进一步发展，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平台得以创立和广泛运用，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的作用日益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续巩固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地区生产总值5.9万亿元。民族地区总体呈现出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



★ 2008年4月11日，四川省遂宁市复桥镇灵龟村举行公推直选村务监督员选举活动，全村200余名群众投票选出新的村务监督员。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一步实施。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初步建立。随着城

市化进程加快，村民委员会继续减少、居民委员会逐年增加，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村民委员会59.0万个，居民委员会8.9万个。在城乡广阔天地里，亿万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十七大以来，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日益广泛深入开展。农村普遍开展了8轮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98%以上的村委会依法实行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的方法得到普遍运用，秘密写票处普遍设置，竞职演讲、治村演说等形式普遍实行，村民参选率达到95%。城市开展了6轮以上的居委会换届选举。村（居）民会议及其村（居）民代表会议经常召开，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定期报告工作、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等活动普遍开展。自治范围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基层群众自治的形式日趋丰富。

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任务。2004年，中央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实施的第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从民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入手，司法改革走向整体统筹、有序推进的阶段。2008年，第二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司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改革任务，改革进入重点深化、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党和政府通过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提升了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水平。加强人权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载入宪法。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该法总则。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限制适用羁押措施，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严格控制和

慎用死刑，健全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制度，努力把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稳妥有序推进。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政府组成部门，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2008年，按照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进行了又一轮机构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迈出新步伐。2007年1月，国务院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步入法制化轨道。从2010年开始，各级政府积极推行财政预算公开，政府收入全部公开，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党中央提出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评估体系。2008年被称为“问责年”，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河北省石家庄“三鹿奶粉事件”等进行问责，严肃处理了有关责任人。截至2010年底，全国约有1/2的省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不断健全、形式不断丰富、渠道不断拓宽。“开门立法”已经成为常态，公众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召开听证会等征求民意、吸纳民智的形式普遍采用。在政务公开中，2011年有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首次公开了“三公经费”[①]。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在反映民意、凝聚共识方面的作用，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各级负责同志经常同网民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2009年两会前夕，新华网、腾讯网等各大网站相继推出“总理请听我说”“我有问题问总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征集”等互动平台，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网民参与。截至2012年2月，累计有50位省委书记、省长，350位地市级一把手，550多位县委书记先后在人民网网友留言中公开回复网友意见建议，开展留言办理

①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



★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工作平台与广大网民在线交流。

工作。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同群众建立联系的一条经常、便捷的通道。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人民依法享有越来越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进入新世纪，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党顺应形势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一系列指导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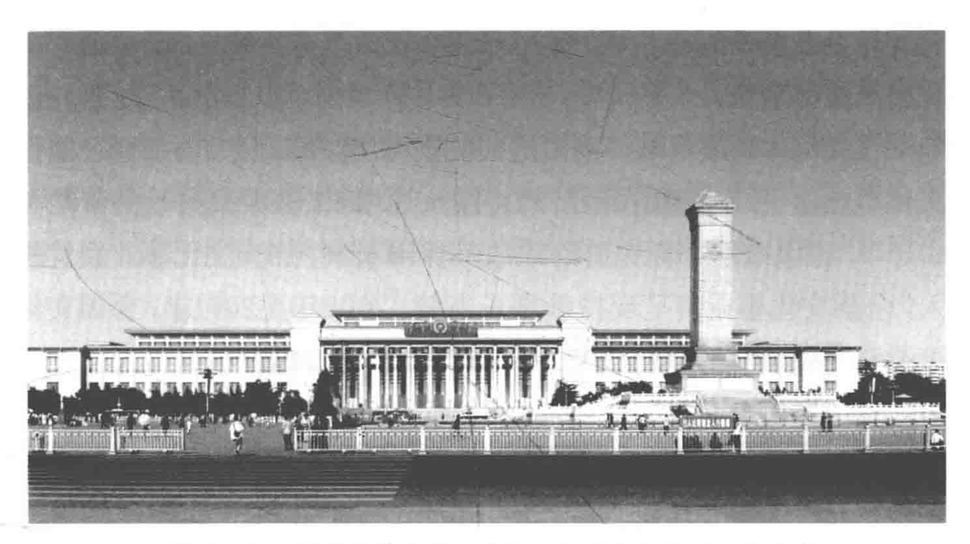
党、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上述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使我国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深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和信心。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程持续推进，逐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哲学社会科学同样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早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工程，持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重点教材等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和优秀理论读物。这对新形势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没有把



★ 2011年3月竣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崭新的姿态向海内外观众开放。

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作明确区分，政府统包统揽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进入新世纪，党明确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党的十六大首次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部署。此后，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方针，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进行。截至2012年6月底，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承担改革任务的2102家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改革任务的达1913家，完成率达到91%，其中转企改制占61%、撤销占20%、划转占19%。保留事业体制的院团不断深化内部机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以企业为主体、事业为补充的新型演艺体制格局正在形成[①]。为搞活广播电视的经营机制，从2009年开始全国广电系统推进了制播分离的改革。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形成。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设立国

① 国家统计局编：《科学发展谱新篇：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有文化企业资产管理机构，管人、管事、管资产有机统一，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

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党和政府大力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中央财政的带动和引导下，各级政府不断完善财政政策保障机制，加大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全国文化事业费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02年至2011年，全国文化事业费由83.66亿元增至392.62亿元，年均增长18.7%。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由2002年的6.51元提高到2011年的29.14元[①]。其中，文化事业费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基层和农村，并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文化事业费结构的调整，有效改善了文化民生，促进了文化权益均等化。截至2011年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前完成，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和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公共图书馆2952个，文化馆（站）4.4万个，其中乡镇文化站4万个。农家书屋工程从无到有，到2011年已建成50.5万家，覆盖84%的行政村。农村基层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明显改善。国家实施全国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惠民工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提高。在家门口广场看文艺演出，进图书馆听公益讲座，在社区文化站免费借阅书籍，品味文化、享受文化有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

适应市场需要，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年平均增速达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市场空前繁荣。2011年全国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558部，比2002年增长458%，年均增长21.05%，已占到国际电影总产量的1/10，排名世界第三。

---

① 国家统计局编：《科学发展谱新篇：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国产影片成为我国电影市场主力，2011年国产影片票房已占到总票房的56%，连续7年超过进口影片的市场占有率。2011年全国电视剧产量再创新高，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共计469部1.5万集，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稳居市场主导地位。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更加完善，出台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专项政策，努力推动文化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党高度重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进一步推动文化走出去。到“十一五”期末，我国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先后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全方位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逐步形成。“欢乐春节”“中华文化年”“中国文化节”“文化中国”“相约北京”“中非文化聚焦”等大型品牌文化活动成功举办，影响广泛。海外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我国在海外设立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9个中国文化中心、322个孔子学院。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对外广播和影视在播出语种、播出时间和发射功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节目和频道在境外有效落地，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一批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贸易平台影响日益广泛，近2万所海外华文学校、数千家华文媒体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步伐加快，核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出口快速增长，在欧美国家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出口逆差逐步减少，图书版权输出引进比从2002年的1∶15缩小到2011年的1∶2.1。中华文化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全民健身运动深入普及，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体育产业初具规模，体育事业发展进入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迈进的新阶段。

文化改革发展坚持重在建设方针，取得丰硕成果和显著成效。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市场日益繁荣，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相映生辉，为城乡亿万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党秉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和政府坚持以教育公平为重点，加快教育事业改革发展。2008年，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费，惠及1.6亿学生，减轻了亿万家庭的经济负担，确保了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2010年7月，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 上海本地学生和外来民工子女共同学习。

要（2010—2020年）》，提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对未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1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82万人，在校生2309万人，毕业生608万人，比2002年分别增加361万、1405万和474万人。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2011年，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招生814万人，在校生2205万人，毕业生660万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较大幅度增加，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经过多年努力，大批学校面貌焕然一新。适龄儿童绝大多数都能上学，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也能基本保证不因贫困而失学。各地还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9年提高到2010年的9年以上，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已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体。

就业是民生之本。党和政府始终把就业作为事关民生、事关全局的大事紧抓不放，不断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颁布实施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促进就业、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的法律法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在研究应对措施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保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广开农民就业门路，帮助城市困难家庭就业，从而保持了社会就业大局的稳定。2011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6亿人，比2002年增加282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从2.5亿人增加到3.6亿人，增加1.1亿人；乡村就业从4.8亿人减少到4.1亿人，减少了7615万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末的34.3%提高到2011年末的47.0%。农民工数量不断扩大，2011年总量达到2.53亿人。在世界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我国保持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分配制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重点改善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生活。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不断扩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础上，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减除标准。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年至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其中，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2011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



★ 2010年1月，内蒙古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巨字号村村民领到养老金。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4亿人、4.73亿人、1.43亿人、1.77亿人、1.39亿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末全国列入试点地区的参保人数达到3.26亿人。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开始启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覆盖人数超过13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2011年末，2277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5306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比2002年增加212万人和489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不断下降。以低收入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2年末的8645万人下降到2010年末的2688万人。2011年实行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划分为新的贫困线，把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国家还加强政策调控稳定住房价格，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大力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使越来越多的住房困难群众正在实现“安居梦”。



★ 2007年8月，广西南丹县低保户领到了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医疗卫生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党和政府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手，努力破解这道难题。2003年“非典”之后，党和政府推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药品生产、流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妇幼保健得到加强。2009年，《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同时出台。新医改方案针对当前医药卫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公益性原则，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2011年，新医改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就，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初步建立起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城乡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取得重要进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正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稳步迈进。

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失调、社会失序、人们心理失衡、社会矛盾增多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管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任务。党和政府积极探索完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新路子、新举措，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要进展，社会管理体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方式方法发生深刻变化。各地以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需求为导向，密切关注社会治安新特点、新动向，紧紧抓住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城乡社会组织较快增长，截至2011年底，共有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6.2万个，社会组织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发展迅猛，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决策部署，截至2011年底，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达20余万人，群众不断增多的心理疏导、心理抚慰、人文关怀等服务需求得到较大满足。公共安全体系逐步健全，“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和体制、机

制、法制）不断完善，形成了基本覆盖各行业、各领域的较为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为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提供了有效保障。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急剧转型过程中，我国始终保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继续取得新进展。进入21世纪，通过继续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我国人口逐步进入平稳增长期，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我国作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人口工作加快从以单纯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治理、优质服务转变。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家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党的十六大以后，深入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修改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继续颁布实施妇女发展纲要，保障妇女平等获得就学、就业、社会保障、婚姻财产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妇女卫生保健、扶贫减贫、劳动保护、法律援助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实施儿童发展纲要，依法保障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妇女儿童地位得到改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峰值高、老龄化程度不均衡的特点。人口老龄化在给我国健康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总体看，中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相交织，人口老龄化与经济

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党中央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决策，积极推动实施“发展为根本、保障为基础、健康为支撑、参与为动力、和谐为要求”的老龄化战略，努力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我国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朝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扎实推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种种努力，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据有关调查，有近70%的城乡居民认为生活水平比五年前有所上升，有近60%的城乡居民认为未来五年的生活状况还将继续改善。但是，城乡居民对住房、就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保障、食品和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和惩治腐败等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多期待。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并把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的重要成果。由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逐步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党中央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得到加强，环保事业不

断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不断增加。资源环境存在的严重问题，不仅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各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结合实际，创造了许多好做法并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主要是：制定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截至2012年上半年已有8个省（区）出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文件；创新完善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很多省成立领导小组，多部门联动，并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大力推行生态示范创建活动，已有15个省（区、市）、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生态省市县建设；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有所提升，公众主动投身低碳消费、绿色出行等活动[①]。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完善环保立法。我国相继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出台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行政法规。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国家还将环保目标纳入五年规划之中。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的目标，除规定“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以外，还规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这是我国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的约束性指标。环保管理机构得到建立健全。国家先将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总局，2008年进一步升格为环境保护部。与此相对应，省、市、县人民政府成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充实人员编制，加强机构队伍建设。环保投入

---

① 周生贤主编：《环保惠民　优化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回顾（2002—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各族渔民在经过治理后的洱海捕鱼。

力度不断加大，各级财政对环保的投入逐年增加。“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环保投资是“十五”时期投资的近3倍，带动全社会环保投入达2.16万亿元，有力推动了环保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环境保护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2005年底，因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国家环保总局叫停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元的在建项目。对此，群众拍手称快，称赞环保行动开始动真格的了。“十一五”期间，环保部门在国家层面对不符合要求的822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不予受理、不予审批或暂缓审批等决定，涉及投资近3.2万亿元。环保宣传大力加强，进一步增强了公民的环保意识。

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党和政府将节能的重点放在搞好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节能工作上，并依法淘汰了一大批小火电、小煤矿等落后产能。同时，实施规划纲要提出的10大重点节能工程、重点流域区域工业污染治理工程、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范项目，推动了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国家环保总局同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减排目标责任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挂帅的节能减排领导小组。2007年，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有关部门发布《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 新疆达坂城风车田。

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上述政策措施，节能减排取得进展，“十一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累计分别下降14.29%和12.45%，均超额完成10%的减排任务[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有所减缓，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1年，在全国开展评价的18.9万公里河流中，Ⅰ—Ⅲ类水河长的比例为64.2%。在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2级以上（含2级）标准的城市占监测城市数的88.8%。2011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11303万立方米；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3.6%。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2011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1%。

国家还大力加强生态工程建设。全国森林覆盖率由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2004—2008）数的20.36%增长到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2009—2013）数的21.63%，超过“十一五”规划目标。福建省以63.1%的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首位[②]。在一些重大工程建设中，从设计到施工都注意对

① 国家统计局编：《科学发展谱新篇：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② 《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1月25日），《福建日报》2010年2月5日第2版。

生态环境的保护。在青藏铁路建设中，为藏羚羊迁徙预留了33条通道。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党和政府加快发展绿色低碳能源，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相关政策，加大对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有序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鼓励和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能源。到2010年，我国核电在建规模、水电装机容量、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农村沼气用户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位。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积极成效。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人们自觉提着环保袋购物，争当环保志愿者，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仍然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生态系统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天然森林减少，草原退化。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实现天更蓝、水更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仍是党和国家集中考虑、大力实施强有力举措的重要方面，也需要全社会的继续努力。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十一五”胜利结束，标志着在本世纪头一个十年我国成功抓住并利用重要战略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第二个十年，能不能继续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十二五”时期无疑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

党中央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从国际上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同时，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从国内看，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资金充裕，科技和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重大挑战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继续前进作出全面部署。全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习近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建议》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建议》的鲜明特点，是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科学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面对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要推动科学发展，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正式使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由此前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明党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二五"规划确定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党中央在深入分析世情、国情变化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按照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要求，《建议》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人民生活、社会建设、改革开放等方面，提出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这个规划纲要。

“十二五”规划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之初，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最突出的就是要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党中央、国务院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大解决突出问题的工作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明显进步。

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党中央、国务院着力把握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力度和重点。2010年第四季度，中央及时提出把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很快遏制住一度出现的物价过快上涨势头。2011年第四季度，提出加强预调微调，并在2012年5月明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多项措施，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拉动内需，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和范围，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出台多项家电、汽车下乡以及减免税收等措施，积极促进家电、汽车、住房等热点消费。推出海南岛离岛免税购物等政策，支持旅游、文化、信息等服务消费。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一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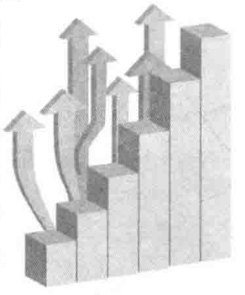
件的形式印发《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召开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了一系列支持水利的重大政策举措，当年落实建设投资3452亿元，创历史新高。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2012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2007年提高9.1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的45.8%提高到56.5%。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为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能力，国家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4%的目标。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高。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取得一批突破性科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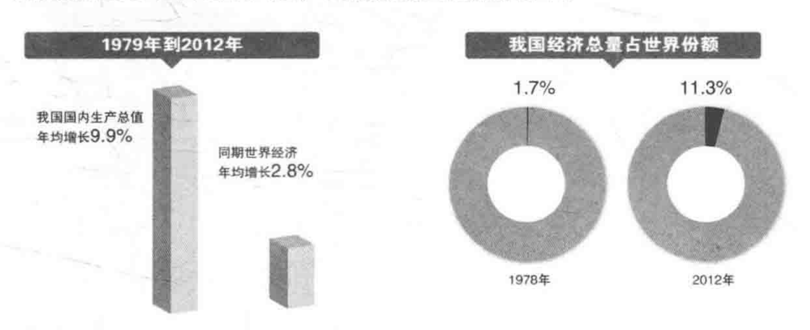
1978—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示意图

3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

	1978年	2012年	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3650	534123	↑ 23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382	39544	↑ 16倍
外汇储备（亿美元）	1.67	33116	↑ 1.98万倍
财政收入（亿元）	1132	117254	↑ 103倍



数据来源：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增长倍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果。“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先后成功发射并顺利交会对接，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进展。“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2011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出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2012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至此，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以来，国务院10年来分6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

国家继续采取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继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十二五”规划实施开局良好，实施顺利，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新世纪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与祖国统一大业

进入21世纪，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海峡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

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刻揭示军队力量建设与运用应遵循的基本指导规

律，推进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形成了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领域的建设取得巨大进步，有效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2004年，中央军委充实、完善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作为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为强化军兵种在我军力量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在战略指挥层次上推进联合作战，作出了海军、空军、二炮部队司令员参与军委班子工作的重大决定。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军队历史使命提出新要求，指出，军队要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005年4月，胡锦涛明确提出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



★ 2007年6月30日，胡锦涛在香港昂船洲海军基地检阅驻港部队。

科学发展观，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全面建设，切实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效益，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2006年10月，胡锦涛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的要求。2010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了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

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人民解放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是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及时印发《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意见》，推动全军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步步深入、扎实推进。2003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再次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08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2009年3月，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意见》，进一步拓宽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领域和功能。全军涌现出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防空旅、载人航天英雄集体、“科学发展好九连”和杨业功、华益慰、方永刚、龚曲此里、向南林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继续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2003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决定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员额控制在230万以内。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任务是：压缩规模，改革体制，优化结构，调整编组，完善制度，从编成结构上提升军队战斗力。到2005年底，圆满完成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确定的任务，如期裁减员额20万。强化军委总部战略管理功能，组建人民解放军战略规划部，将总参通信部改编为信息化部，将总参军训和兵种部改编为军训部。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调整优化各军兵种规模结构，改革部队编组模式，推动作战力量编成向精干、联合、多能、高效方向发展。

积极推进人才战略工程，人才培养工作持续健康发展。2003年8月，中央军委颁发《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部署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2011年4月，中央军委颁发的《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对未来十年军队人才建设和发展作出中长期战略规划，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军队人才建设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央军委还分别于2009年7月和2011年4月两次召开全军人才工作会议，大力推动和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

根据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积极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加强联合训练，推进军事训练改革创新。2006年6月，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作出《关于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的决定》，对军事训练创新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此后，总参谋部颁发《关于加强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的意见》，2008年颁发新的《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2012年5月颁发《基于信息系统集成训练指导纲要》，对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进行具体规范和指导。全军成功组织了一系列重大联合战役、战术训练和演习。2007年举行“砺剑—2007”复杂电磁环境下联合火力打击研究性演习。2009年8月举行的“跨越—2009”演习，组织沈阳、兰州、济南、广州四大战区各一个师进行远程机动和对抗性演练，开启大规模跨区远程机动训练的序幕。在2011年3月召开的全军深化军事训练改革会议



★ 2007年进行的“铁拳—2007”复杂电磁环境下实兵检验性演习战斗。

上，进行了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网上对抗演练，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十多个训练基地和全军数十个作战单位同台对抗。

坚持以信息化为方向，加快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加强现有武器装备改造和管理，切实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和有机融合。基本建成以第二代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大批高新技术装备快速进入序列。陆军形成以直升机、装甲突击车辆、防空和压制武器为骨干的陆上作战装备体系；海军形成以新型潜艇、水面舰艇和对海攻击飞机为骨干的海上作战装备体系；空军形成以新型作战飞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为骨干的制空作战装备体系；第二炮兵形成以中远程地地导弹为骨干的地地导弹装备体系。

深化联勤保障体制改革，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继2000年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改革后，2004年7月1日起，在济南战区启动大联勤试点体制，为在全军推行三军一体化后勤保障体制摸索经验。2007年4月1日起，大联勤体制编制在济南战区正式实行。随着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后勤保障体制在实现三军联勤的基础上，正朝着三军一体化的改革目标稳步前进。在实行三军联勤体制改革的同时，后勤各项改革也稳步推进。加快军民融合，后勤保障社会化逐步推进。加大基础设施和边海防部队建设投入，提高军人工资津贴标准，完善住房、医疗、保险等保障，推广军人保障卡系统，换发新式军装，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部队训练、工作和生活条件，增强了官兵的荣誉感、自豪感。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重大战略思想相适应，军事外交服务国家政治安全和外交大局，取得积极成果。人民解放军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格局。通过适度开放部队营区和军事演习，定期发布国防白皮书，建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开通国防部网站，对外开放呈现新局面。人民解放军先后与30多个国家的军队举行了近60次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和训练。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向机制化方向



★ 2009年10月1日，胡锦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发展。从2005年开始，具有战略影响、战略层次的较大规模“和平使命”系列联合军事演习，震慑和打击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提高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等机制下的地区防务对话与合作，对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展示了中国军队的过硬素质和良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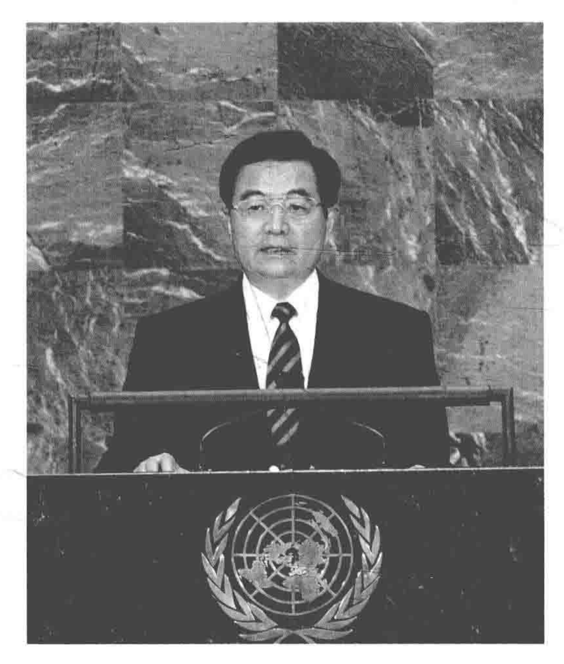
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新世纪以来，人民解放军执行任务种类之多、用兵规模之大、出兵频率之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少有的。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抗击“非典”、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和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等抢险救灾行动，圆满完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阅

兵，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安保支援等重大任务。2011年二三月间，因利比亚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分批组织中国在利比亚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35860人安全有序撤离。人民解放军派出海军“徐州舰”和空军4架大型运输机，参加了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海外公民行动。军队还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参加了西部大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地方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重大工程和重要工作。全军和武警部队以专业工程部队为主，集中援建了三峡水利枢纽、兰（州）成（都）渝（重庆）输油管线、上海洋山深水港、大庆石油管线改造等1000余项重点工程。

党的十六大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党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建军治军经验。主要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首位，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坚持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来抓，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军队建设质量，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军队建设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些宝贵经验，既是新的实践的结晶，也是对我军长期坚持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进入新世纪，党对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点作出科学判断，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顺应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新兴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世界公认。党中央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

共同发展。

党和国家以不同方式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胡锦涛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7月1日，中俄首脑将“和谐世界”的表述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2006年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得到确认。

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



★ 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积极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中国同主要大国的关系保持稳定并有所发展。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和发展，双方各层次对话与交往密切，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两国在经济、科技、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有所加强。2011年1月，胡锦涛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能源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配合、协作，共同推动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004年10月，中俄签署《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6月，互换补充协定批准书。2008年10月，两国外交部通过换文确认《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正式生效，中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同欧盟和欧洲大国合作进一步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充实，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持密切的高层往来。中欧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环保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保持蓬勃发展

的势头。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两国在政治层面保持交往和接触，经贸合作继续推进。2008年5月，胡锦涛访问日本，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之间自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以来又一个重要政治文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与日方进行坚决斗争，发表了《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海基线的声明》和《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并通过常态化执法巡航等措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实施管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中国还同各主要大国启动了战略对话磋商机制，定期对各自关切的现实和长远问题交换意见，探寻解决办法。这一机制成为联系和稳定中国同各主要大国双边关系的纽带。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国同几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高层互访和交流，增加了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深化了各领域互利合作。中国稳步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等区域合作进程，促进地区国家共同发展。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推动各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深化同中亚国家务实合作，加大对中亚国家信贷支持，2009年底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竣工通气。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进入新阶段。2005年4月，中国同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等邻国宣布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印两国还签署《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中国推进中日韩合作，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及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实施中日韩合作行动计划，积极参与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建设。中国巩固同朝鲜、越南、老挝、巴基斯坦等国的传统友谊，推进睦邻友好合作。中国坚持维权维稳相统一，妥善处理有争议的问题。2002年11月，中国同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宣言是



★ 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交谈。

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为相关国家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和共同开发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到2010年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使世界上近1/3人口得到实惠。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取得重要进展。2005年4月，在印尼举行的亚非峰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与亚非国家合作共赢的明确立场，强调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经济上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文化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安全上平等互信、对话协作。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同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峰会宣言郑重宣示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规模最大、与会外国领导人最多的一次国际会议。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先后兑现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对非洲国家的承诺。2010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在论坛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将中阿整体关系提升到新水平。进入21世纪，中国与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高层交往空前密切，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合作格局。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

文件》，提出中国将致力于同上述地区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拉方积极响应，为双方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有效拓展了国际合作空间。

中国通过多边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以联合国为重点的国际组织多边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坚持维护联合国及安理会权威，积极承担应尽国际责任，参与多边机制建设和联合国改革进程，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努力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重大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引起各国关注。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核不扩散、安全反恐、公共卫生、减少贫困等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上，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置上，中国都积极参与，推动妥善解决，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中国认真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通过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活动，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建设，积极引导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吁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在自身面临诸多困难的形势下，不仅以本国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而且向陷入困境国家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国家克服困难，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进入新世纪，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2010年加入）五个金砖国家[①]逐渐发展为国际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从2009年开始，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金砖国家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峰会，本着

①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金砖四国”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10年，南非申请加入获通过，“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遂改称“金砖国家”。

开放、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的方式推进金砖国家合作。金砖国家之间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层次不断拓展，成果不断涌现，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和发展领域加强协调，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还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开展了各领域外交。主要有：以经济外交为着力点，以首脑外交为统领，以峰会外交为平台，发挥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负责任大国作用；以安全外交为保障，建立并深化与上海合作组织及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有力维护了国家稳定大局和主权安全利益；以公共、人文外交为抓手，以民间外交、城市外交为载体，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广交深交朋友，把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作为重要契机，积极推动软实力建设；以"外交为民"为宗旨，稳妥处理撤侨、人质解救、劳务纠纷等重大突发事件，有效维护了我国海外合法权益。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推进政党外交，到2011年，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格局。

从大国外交到周边外交，从发展中国家关系到多边事务，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外交双边与多边并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新型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领导人的身影更加活跃，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这既为我国发展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主有序发展，民众安居乐业。“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得到成功验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根据海峡两岸关系和台湾形势的变化，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又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采取一些新举措，推动两岸关系取得新发展。

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全力支持香港、澳门发展。

香港、澳门的民主政治得到有序发展。回归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立法会选举的直选因素不断增加。特别是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以作出适当修改；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这就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普选设定了时间表。此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完成了对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修改。201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正案分别予以批准和备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主政治也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向前发展。2011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作出解释，明确了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立法会产生办法的程序。澳门特区2013年及以后的立法会、2014年及以后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进入具体操作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提振香港经济，中央政府推出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部分城市居民个人赴港旅游、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推动内地企业在港上市、深化粤港合作、启动泛珠合作、推动沪港京港合作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开放内地部分城市居民赴澳门个人游、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促进了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香港、澳门遭受“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央政府努力维护港澳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集中推出支持港澳稳定金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并较好地衔接和落实支持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港澳开展对外交往，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建设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大对澳门经济发展和适度多元化的支持力度，扩大澳门人民币业务平盘及清算范围，支持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建设。为发挥澳门在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方面的独特优势，从2003年至2010年中央政府支持澳门特区连续举办三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不仅有效推动了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使澳门与葡语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得到加强。

为加强内地和香港、澳门的交流合作，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003年，中央政府先后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此后又签署多个补充协议。这一系列协议的实施，提高了内地与港澳经济交流合作的水平，对港澳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内地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了加快珠港澳三地经济融合，2008年底，国务院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把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2010年4月，广东省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全国第一份省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议，首次明确提出粤港两地金融合作以香港为龙头。2011年3月，广东省又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议。这两份协议对于广东与港澳的合作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作为粤港澳合作的重点，中央政府还积极推进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合作开发。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内地累计批准港商投资项目33.6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5267.1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的45.1%。

香港、澳门繁荣发展，显示了“一国两制”方针的生命力。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也正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香港、澳门的明天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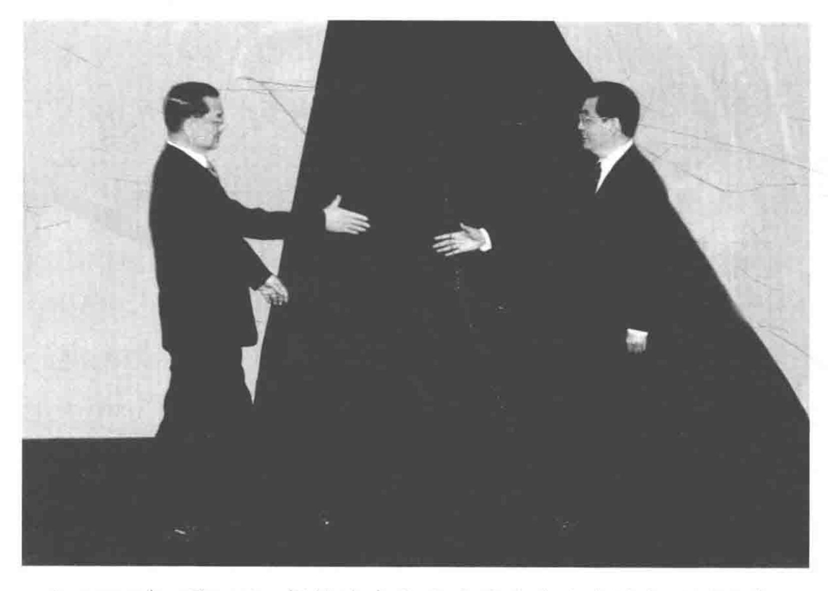


★ 2005年3月14日，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们对《反分裂国家法（草案）》进行表决。

会更加美好。

中央政府坚定不移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鉴于进入新世纪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形势，党中央将反对和遏制“台独”摆在对台工作更为突出的位置上。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这四个“决不”的主张，在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反响，受到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以最大诚意和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表明了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推动下，经过多方努力，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受邀访问大陆。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会见连战，实现了6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历史性握手。胡锦涛总书记在同连战会



★ 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谈时强调，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两党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就发展两岸关系和两党交往的重大问题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交流，这是我们两党正视现实、开创未来的重要标志。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福祉，基于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立场，共同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背景下两党交往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党的共同主张。这符合两岸同胞的期待，也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潮流。胡锦涛与连战共同发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国共两党达成一系列共识，包括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对于恢复两党关系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开通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其他党派的往来具有引领作用。此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胡锦涛分别同他们会见、会谈，共同发表公报，达成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等多项共识。

在党际交往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形势下，大陆方面实施多项对台惠民政策措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加强。根据国共两党领导人关于两党建立定期沟通平台的倡议，2006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举办首届两岸经贸论坛。10月，共同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从2007年开始，将此类论坛统一命名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至2012年7月共举办八届。通过论坛平台，大陆方面推出多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两岸政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台湾陈水扁当局借推动“宪改”和“入联公投”等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图谋，一次次被挫败。海外侨胞在约8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近200个反“独”促统组织。反“台独”斗

争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理解和支持，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纷纷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2008年3月，在台湾地区举行的选举中，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下台，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局势出现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党中央作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决策部署。两岸双方本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2008年6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制度化协商。11月，海协会代表团首次赴台商谈。12月，两岸海、空直航及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开历史性步伐。时隔不久，大熊猫“团团”“圆圆”运



★ 在天津港举行的海峡两岸海上直航首航仪式。

抵台湾，带去13亿大陆同胞的祝愿，增进了两岸民众的感情。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在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主张，即：第一，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第二，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第三，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第四，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第五，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第六，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这六点主张，揭示了祖国和平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对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岸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制度化协商得以稳步推进，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大陆出台了多项惠台措施，组织大型赴台采购活动，启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等，取得积极成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恢复商谈以来，至2012年8月，两岸两会共举行8次会谈，签署18项协议。特别是2010年6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推进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进程，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率先在经济领域取得突破，两岸经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2011年1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并开始运作。

在两岸经贸关系逐渐迈入正常化的基础上，两岸在学术、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交往不断深化。为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大陆推动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两岸文教交流活动。从2009年开始，大陆每年举办一届海峡论坛，吸引两岸基层民众和各界人士广泛参与两岸交流合作。2011年6月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的正式启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和感情融合。

中国政府还妥善处理了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涉台外交问题，减少了两岸在涉外事务领域的摩擦，关心台湾同胞在海外的经济、民生、安全问题，在协助处理台胞涉外纠纷等事务中切实维护台胞的合法权益，照顾台胞福祉。这一系列举措，既获得了台湾岛内民众的欢迎和赞誉，又巩固了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格局，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添了积极因素。

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澳门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与内地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海峡两岸同胞联系更加紧密、感情更加贴近、利益更加融洽，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了有利条件。

六、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推进党的建设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紧密结合治国理政实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这是由执政党的地位决定的。经过50多年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2004

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决定》总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决定》提出，要通过全党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围绕上述目标任务，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决定》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显著提高。党领导国家立法机关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修订了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组织法，颁布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完善了根本政治制度，使党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从而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规范的法律框架。党还先后出台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加强人民政协工作以及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文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扩大了人民民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党的十六大作出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定。党的

先进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事关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完成。2000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开展了对30万党员思想状况的调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作了专题研究。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中央着眼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为开展好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选择19个单位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出要求。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作出部署。2005年1月，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体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投身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干部尤其要发挥表率作用，并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命题。

从2005年1月起，全党开展了为期一年半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央强调，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习贯彻党章为重点，着眼于取得实效和群众满意，在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上狠下功夫。

先进性教育活动分三批进行，每批大约半年时间，分为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到2006年6月基本结束。整个活动主题鲜明、领导有力，措施得当、工作扎实，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影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通过这一活动，广大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有群众称赞身边的党员"日常工作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能豁得出来"。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新建基层党组织13万个，整顿软弱涣散、不起



★ 2005年3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系列报告会举行。

作用的基层党组织15.6万个。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行动更加自觉，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在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与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1347万个。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努力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涌现出以人民的好公仆郑培民、人民的忠诚卫士任长霞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用行动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党中央及时对先进性教育活动经验进行总结，提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2006年6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等四个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文件，为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成果、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六大以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认真落实十六大提出的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的号召，建立了集体学习制度，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共进行集体学习44次。这一学习制度的建立，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理念，为全党起到了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2004年4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五个文件，进一步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五个文件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拓宽选人视野，引进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加强干部的监督管理，规范党



★ 2003年12月19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

政领导人才的正常流动；有利于扩大党员和群众对于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但干部选拔任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集中反映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问题。这些看起来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干部工作导向问题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需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进一步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动形成有效管理、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作为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具有总章程性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对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具有里程碑意义。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明确了公务员范围、公务员登记、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等，为明确公务员法入轨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创新干部管理体制，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行公开选拔、公推直选，健全来自一线干部培养选拔链，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展。党还十分重视加强人才工作，把人才工作纳入到党的组织工作之中，成为党的十六大以后组织工作的一个特点。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强调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决定》进一步明确党管人才原则。201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基本思路，确定了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的全国人才队伍建设整体布局。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贯彻实施，我国的人才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

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一系列部署，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发展。党进一步明确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工作思路，坚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根本要求，着力形成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资源整合的工作格局。农村党的建设以“三级联创”[①]活动为总抓手，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创新。为了扶持、帮助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中央针对全国近10万个村级组织没有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由中央财政和中央管理的党费拿出17.5亿元，地方计划配套64亿元，用2年时间集中解决。到党的十七大之前，各地已新建村级活动场所7.3万个，完成建设任务的74.3%。认真抓好县乡村领导班子建设，选派大学生到农村任职，并在全国稳步推进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从2004年起，通过深入开展创建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四好”领导班子活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发生明显转变，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创新创业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在城市社区党建工作中，各地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初步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许多地方组织社区中的党员开展党员承诺制、党员志愿者、党员义工、结对帮扶、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特色鲜明的活动，服务群众，深受欢迎。着眼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其他社会阶层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可以入党，根据这一精神，各地依托街道、社区党组织，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通过设立联合党组织、党员服务站、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以及帮助组建工会、共青团组织等办法，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城市街道、

---

① “三级联创”，指基层党建工作中，以“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为主要内容的“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先进县（市）的创建活动。

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任务写入党章，各地把推进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党组织工作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工程来抓，取得显著成效。各地还把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党建工作纳入基层党的建设总体规划，许多地方采取建、联、挂、派等方式建立党组织，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取得了良好效果。各级机关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协助和监督两大职能，在促进中心工作、加强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团结凝聚群众和建设和谐机关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基层党组织建设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年份党的基层组织数量情况

单位：个

年份	总数	党委		总支部		支部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1978	2116006	95758	4.53	76660	3.62	1943588	91.85
1981	2380334	106511	4.47	83893	3.52	2189930	92.00
1991	3240001	142619	4.40	145307	4.48	2952075	91.11
2001	3486886	167312	4.80	188499	5.41	3131075	89.80
2011	4026590	190743	4.74	249511	6.20	3586336	89.07

数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供。

党内民主建设取得新进展。党的十六大以后，从经济社会发展到党的建设，从重大改革到重要规划，从重大灾害应急到国际热点应对，每逢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都召开会议进行讨论，集体作出决策部署。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开始，中央政治局都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各地积极探索改进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党内选举制度不断取得新进展。干部

选拔工作中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成为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考察预告、任前公示、试用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制度全面推行。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把党内监督的重点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为开展党内民主监督提供了根本依据。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的要求，各地党务公开逐步推开。各部门积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2010年6月30日，中央纪委以及中央组织部等十个部门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外界展示了执政党公开透明的形象。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党的十七大作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部署。十七大之后，选择23个单位进行试点，取得了经验。在试点基础上，2008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9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继续，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学习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每批历时半年左右，于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有370余万个党组织、7500余万名党员参加。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主题鲜明，领导有力，组织严密，措施得当，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



★ 2008年9月，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会议召开。

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活动期间，各地党组织为群众办实事好事1780万件，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140余万个，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共修订完善各类规章制度250多万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各地共新建党组织6万多个，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5万多个。各地区各部门还制定了一些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了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党中央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新的决策部署。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归根到底是要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

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实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主要有三项要求：一是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二是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三是继承和发展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成功方法，又要不断创新和丰富党的建设有效管用的新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作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决策。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中央及有关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2009年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原则、工作内容和途径方法。二是先后于2010年2月和11月召开座谈会，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三是经中央批准，成立由中央宣传部牵头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协调小组，并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成立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加强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四是推荐学习书目。这些措施，有力促进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各地区各部门把学习创新工作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科学发展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切入点，推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取得初步成效。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以“创建先进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的活动。2010年4月5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出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基层党组织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实践中建功立业，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围绕科学发展和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提供了组织保障。

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各级党组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还重点抓了以下工作。一是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汇报工作，重大问题全委会票决制。健全部门党组（党委）工作机制，健全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的体制机制。落实200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任期制得以实施。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以实施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为抓手，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重视做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工作，着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推进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三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2009年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健全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选人用人机制，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干部考评体系。改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差额选拔等工作。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工作力度。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到省市区交流任职，选派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做好干部援藏、援疆工作。匡正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开展选人用人群众满意度调查。坚持从严管理干部，健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四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把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积极进行人才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五是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对农村、城市社区、国企、机关、高等学校、非公有制企业等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从组织设置、人员经费、活动场地、作用

发挥、党员轮训等多方面作出制度安排。落实2009年6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09—201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全面实施党员培训工程。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2012年3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就非公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工作机制、教育培训等事项作出规定，为引导和推进基层党组织科学发展提供了指南。建设覆盖百万基层党组织书记、“村官”的手机信息系统，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六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制度建设，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防止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从严管理干部、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等制度文件的修订和出台，有效解决了党的建设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党内法规制定程序，保证党内法规发挥作用，2012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努力通过规范党内法规的制定、审批、备案和清理活动，促进从严治党，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逐步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2004年1月，十六届

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出部署。200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提出了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工作任务和基本要求，确定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200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纲要》和《工作规划》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它们的颁布，标志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此外，还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

在反腐倡廉建设基本思路方面，逐步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在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体制机制。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形成了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

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根据党章，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定。201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10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为从源头上防治用人腐败，2010年3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等“干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

在依法查处大案要案方面，在坚持查处重点案件的同时，着重查办领导干部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索贿受贿的案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自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万多件，结案63.9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多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万多件，涉案金额222亿多元①。坚决查处了陈良宇、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彰显了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

在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乱涨价、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采取专项治理措施。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陆续开展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小金库”等专项治理工作。同时，针对农村土地征收、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出现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工程建设领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等突出问题，采取专项检查等措施予以纠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在反腐倡廉教育方面，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整体规划，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培训院校课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要求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加强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把反腐倡廉宣传教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总体部署。按照《工作规划》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中央纪委等六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建立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编写廉洁从政教材，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廉政教育培训。对于新任领导干部和新录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任职和上岗前的廉政培训，建立廉政培训档案。在领导干部任职前进行廉政谈话，做到防范在先。

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严峻性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从复杂性看，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不正之风和腐败严重损害党的肌体健康，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更加清醒地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不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仍需要全党上下付出艰巨努力。

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得到全面推进，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

七、党的十八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8200多万党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员。胡锦涛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



★ 胡锦涛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定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要决策和历史性贡献。

大会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阐述。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报告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会进一步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大会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努力实现的新要求。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报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大会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大会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



★ 习近平当选为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习近平、胡锦涛亲切握手。



★ 习近平等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报告强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大会还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全面部署。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和由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八大肩负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启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继往开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壮丽的前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结束语　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继承以往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9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过去的90多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90多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实现社会巨变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多年。

党的十八大对党的90多年历史作了精辟总结，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①]历史和

---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现实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形成是合理的，成就是辉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更大胜利是必然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探索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体现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史，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作为承载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思潮已存在近500年的时间。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从此，社会主义的时代洪流汹涌澎湃，改变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政治力量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但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不能担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处在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全新方向。“走俄国人的路”，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结论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三件大事，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紧紧依靠人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九十多年长期奋斗基础上的。"由三件大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从在新中国执政之日起，就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己任；从开启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之日起，就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红线。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确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决纠正"四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回顾历史可以看出，90多年来，党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奋斗探索的历程是充满艰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尊重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伟大觉醒而开创的，但也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不懈奋斗中走出来的，是在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继着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养料，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夙愿和梦想，承继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践探索所创造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制度基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形成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集中反映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党进行不懈奋斗、理论探索、自身建设的光辉历史，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充分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一，90多年党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翻开近现代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其他政治力量都没能挽救中国社会的沉沦，国家状况一天一天坏下去，民族历经屈辱和苦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由此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件大事揭示了各个时期的历史主题和党的主要任务，共同构成了90多年党的不懈奋斗史。三次历史性转变集中反映了党的不懈奋斗的巨大成就。

第二，90多年党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

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关乎党的命脉。要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寻找正确的道路。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

在党的艰辛探索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创新实践的结果。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90多年党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纯洁性，不断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

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必须有一个“特殊的政

党”来领导。这是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的根本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不仅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与之相应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方式及活动规则在中国也行不通。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如何建设一个不同于以往所有政党的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环境中，成功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一伟大工程，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党的建设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的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继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向前进。

从“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转变，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有力的组织保证。

综观90多年，三件大事是对党的历史的纵向浓缩，而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则是对党的历史的横向展开。党的不懈奋斗

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统一于党领导人民为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探索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中，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90多年不懈奋斗史，就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党的90多年理论探索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并创新理论的历史；党的90多年自身建设史，就是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不断锻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力量的历史。经过90多年奋斗探索，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生机盎然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有着8700多万名党员、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①]党90多年来取得的根本成就，归根结底就是党和人民经过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发展的必然归宿，又在更高层次上包含了其他方面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成就是由90多年各方面成就积累而成的，是90多年所有成就的结晶。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过去革命道路的继续，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艰辛探索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中国特色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5页。

社会主义制度起源于党局部执政时期，奠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历史上一切成就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和归结，从根本上充分展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作为90多年历史发展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其他一切成就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化为乌有，甚至会使国家陷入内乱深渊。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

毋庸讳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只是在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之后，党才能够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但也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这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由于党在独立自主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既总结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成功经验，又汲取教训，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失误和曲折呢？没有一个政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总结、汲取教训。既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而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错误能够成为正确的先导，但不是无条件地成为正

确的先导，关键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真正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中国人民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这固然因为党已经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因为党犯过错误，并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学到了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或者不真正懂得的事情。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党的错误、失误和曲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在党的历史发展中也只是支流，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完善，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呢？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曾经沧海难为水，事非经过不知难。综观90多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9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烁今、举世瞩目，正是因为这些成就来之不易。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党和人民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备尝艰辛而愈加成熟。这充分反映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遇变不惊、知难而进、化险为夷、百折不回的奋斗历程，也集中体现了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为一切困难所吓倒、不为一切风险

所征服，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终能成功开创一个又一个胜利局面的历史逻辑。

90多年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一个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一个为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和巨大贡献的党。中国人民对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充满自信，对这个党创造的光辉历史充满自信，这是建立在对党的90多年历史事实充分尊重基础之上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进一步坚定对党的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深刻总结党的90多年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一系列因素和环节构成的普遍趋势，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之间必然的、普遍的和本质的联系，进一步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的，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这个“三位一体”的概括，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种形态，即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这种概括，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运动，是工人阶级争取全人类解放的运动；同时，它还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崇高、美好、理想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和优势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构成了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功能的内在统一。“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成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面向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进步，社会主义中国的

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是确定总布局、总任务的前提条件，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超前冒进，也不固步自封，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必须紧紧扭住这个总任务，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干下去。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毫不动

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八项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八项基本要求是根据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它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略“五个基本”的格局。八项基本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人民群众新期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主体地位、根本任务、必由之路、内在要求、根本原则、本质属性、必然选择、领导核心等八个方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八项基本要求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涉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还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正确指针。

第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回顾90多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经过90多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即："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①]这个总体要求，从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有机结合的高度，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原则、路径、目标，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反映了党对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最新认识。

党的十八大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②]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深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90多年历史鉴往知今、开启未来。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是指引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用马克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当今中国和世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保证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和中国进步潮头，党和人民的开拓奋进才会始终有光辉旗帜的引领，真理的光芒才能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人民是历史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必须始终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确保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

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

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就能够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同志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尽管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将长期占据优势，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它信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本质特征。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无往而不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实际，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它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从这个最大国情出发，确立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符合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无往而不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最广泛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它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与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一致性，承诺并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最广泛牢固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无往而不胜。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方向是坚定的，成就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懈探索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就一定能够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壮阔的发展前景。

回首90多年党的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增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已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这个最伟大的梦想。

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新的辉煌。创造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任重道远。已经创造90多年辉煌业绩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胸怀理想、坚定信念，肩负民族重托和人民希望，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坚信，只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到那时，党和人民事业必将揭开更加辉煌的崭新篇章！

后　记

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项重要任务。《九十年》的编写，始终得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亲自提出编写《九十年》的重要任务。当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编写《九十年》的请示。《九十年》编写工作启动后，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九十年》的编写，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给予重要指导，为《九十年》编写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后，刘云山同志对《九十年》编写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给予有力指导。分管党史工作的栗战书同志高度重视《九十年》编写工作，多次就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倾注很多心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认真审阅中央党史研究室报送的书稿，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2016年6月，党中央正式批准《九十年》出版。

《九十年》的编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始终把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和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作为叙史论史的根本依据，切实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体现准确、朴实、凝练、生动的良史文风。我们愿通过努力，为广大读者奉献一部有质有文、可信可读的通史类党史基本著作，更好地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本书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编写的，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的九十年》。由于书稿编修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反复修改书稿过程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了记述内容的完整性，我们把这部本来反映1921年至2011年党的历史的著作的时间下限向后顺延一年多，写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书名不变。

本书编写工作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具体领导下进行。2010年9月至2014年1月，编写工作由欧阳淞同志主持；2014年1月以后，编写工作由曲青山同志主持。

本书编写过程中，经报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诚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全国理论界、党史学界一批专家学者，组成由欧阳淞同志为召集人的咨询审议组，负责书稿编写的咨询审议工作。咨询审议组成员有：何毅亭、冷溶、曲青山、郑必坚、李景田、逄先知、滕文生、孙英、邵华泽、王梦奎、魏礼群、龙新民、李忠杰、吕世光、张树军、高永中、李捷、金冲及、沙健孙、石仲泉、谷安林、张启华、章百家、杨冬权、邵维正、林兆木、程中原、董志凯、王顺生。同时，组成由欧阳淞同志为召集人的统改组，负责书稿编写中的统改工作。统改组成员有：邵华泽、王梦奎、张树军、李捷、沙健孙、石仲泉、邵维正、林兆木、程中原、董志凯、王顺生。其中，沙健孙、邵华泽、王梦奎同志分别牵头负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部分书稿的统改工作。

本书的后期统稿工作由曲青山同志主持，王梦奎、陈晋、张树军、李捷、方立、金冲及、沙健孙等同志参加。霍海丹、郑谦、李向前等同志分别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部分的书稿作了进一步统改。完成后期统稿后，书稿分送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有关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形成修改稿。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成员曲青山、张树军、高永中、冯俊同志审阅了书稿，欧阳淞、龙新民、李忠杰、吕世光同志也参与了审阅工作。最后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审定，形成报送党中央的送审稿。

本书编写、统稿过程中，张树军同志协助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

同志做了具体的统筹、组织、协调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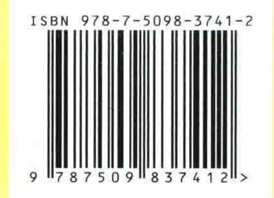
本书编写中，具体承担执笔的同志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刘宋斌；第三章：王新生；第四章：李颖；第六章：庞松；第七章：傅颐；第八章：郑谦；第九章：黄一兵、齐彪；第十章：张士义；第十一章：张神根；结束语：欧阳淞、张树军、陈亚杰。霍海丹同志具体负责第一至第五章编写的统筹工作；张化、武国友同志先后具体负责第六至第八章编写的统筹工作；武国友、张神根同志先后具体负责第九至第十一章编写的统筹工作；蒋建农同志具体负责全书装帧设计、图表选配的统筹工作。王全春、樊得智、汪晓军、黄如军、陈夕同志参与了具体协调和审稿等工作。穆兆勇、沈路涛、任贵祥、段玲玲、叶晖南、王玉如、陈亚杰、王旸、樊锐、孙艳玲、徐鹏堂、王树林、王志刚、樊莉莉、陈坚、张学兵、黄萍、桑东华、徐柳、单伟、孙力、郑林华、郝鹏飞、朱丹、李东方等同志参与了编写服务工作。葛宁、张偲、夏俊杰等同志参与了图表选配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部门的其他同志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的同志，通过不同方式对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本书编写出版工作得到中央办公厅的指导和帮助。在本书编写和征求意见过程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旅游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访局、国家粮食局、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海洋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档案局、国家保密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单位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向上述单位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编写中，注意吸收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精华，借鉴其编写的成功经验，并积极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力求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之能够达到与历史发展、认识水平、研究进展、群众需求相符合的新层次。我们深知，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光辉历史，要浓缩在这样一部60多万字的著作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虽已付出努力，但书中不当、不周之处难以避免。恳请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正，以便我们在适当时机再版时能够订正、充实和完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6年6月


ISBN 978-7-5098-3741-2
9 787509 837412 >
定价：150.00元（全三册）